

中山大学大洋洲研究工作报告

2012年第02号

总第02号

澳洲淘金热中华人移民的环境经验

费晟

2012年11月6日

教育部区域和国别研究培育基地——中山大学大洋洲研究中心

©版权所有，非经允许，不得转载翻印

澳洲淘金热中华人移民的环境经验

费晟，北京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现为中山大学大洋洲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兼任德国瑞切尔·卡逊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Rachel Carson Center for Environment and Society）客座学者。

摘要：

本文首先梳理了澳大利亚华人史研究的发展历程，认为澳大利亚华人史研究虽然在1970年代前受到的关注不够，但近年来已经形成了非常明确的主题，即要求把澳洲华人的历史整合进澳大利亚历史的整体叙事、阐发华人个体的经验、展示早期华人移民活动的完整图景，最终强调其历史能动性。而正在迅猛发展的环境史视角或是值得尝试的研究新路径。

十九世纪中叶珠三角地区的生态与社会危机是移民产生的内部动因，而外部契机则是澳大利亚的淘金热。这种移民本质上反映出资本主义全球资本主义扩张对中国的深入影响，华人移民从一开始就处于一种弱势地位。

华人矿工进入矿区的道路因为种族歧视的原因而比欧洲移民更为艰险。不仅如此，对华人淘金还存在一些陈见，最主要的包括华人只淘洗废旧矿以及华人浪费并破坏水源等。通过对档案与媒体材料的分析，可以认为这些学界定论是片面的，早期华人不仅采取了多样化的淘金方式，而且培育出了自己独特的采矿模式。淘洗废旧矿是受到种族迫害的结果。除了采矿活动，华人还投身于多样化的农业生产活动，特别是蔬菜种植活动，这奠定了澳大利亚蔬菜种植业的基础。

对于早期淘金移民的不公正遭遇，可以从其生存环境的逐步恶劣化中得到深入理解。对于华人生产生活对环境的影响，当时的种族主义话语进行了歪曲和丑化，而这树立了排斥华人的合法性。排华政策反过来恶化了华人既有的生存环境。于是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及政策与华人生存环境的恶化相辅相成，最终形成了系统的排华政策。

This working paper reviews 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Australian Chinese studies firstly and points out that some basic approaches has already been established, although the relative studies were developed slowly before 1980. The new generations argue that we should integrate the Australian Chinese experiences into the whole historical narrative of Australia, focus on personal

experiences and explore the early lives of the migrants. Therefore the academe can uncover the agency of the Chinese migrants in shaping modern Australia. To propel these latest works, the environmental history approach could be valuable.

The ecological and social crisis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in the mid Nineteenth century was the inner cause to the migration while the discovery of gold mines in Australia offered a chance for the bankrupted Chinese to go abroad. This migration to Australia reflected a deeper influence of the expansion of the world capitalist on the China. Moreover, the Chinese migrants were put into a weak position in such a system dominated by European powers.

As pushed by a rising racist sense, the Chinese migrants had to choose more dangerous trek routes to get into goldfields. Furthermore, there was a historical bias toward the Chinese miners: they were “fossickers” who always worked on tailings and wasted water. Depending on new archives and local newspaper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Chinese miners had used various methods for digging gold and developed their unique experiences. The image of “fossickers” is a result of discrimination too. Besides mining activities, the Chinese miners also devote to all kinds of farming works. To a great extensive, they launched the Australia’s market gardening. In a world, the early Chinese migrants actively influenced the Australian society.

For excavating the untold stories of the early Chinese migrants, we should also look into it through an environmental angle: the living and working environment were declining during the gold rush time. The discourse of racist smeared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their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Then it legalized the discrimination to the Chinese migrants and in turn exacerbated their weak position in local society. Finally, the marginalization and isola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and their environments doomed the discriminative fate of the early Chinese migrants.

淘金热中华人移民的环境经验.....	2
第一节 澳洲华人史研究的流变与环境史视角的提出.....	5
澳洲华人史研究崛起的历史背景.....	5
澳洲华人史研究之流变.....	6
淘金热华人移民史研究的环境史视角.....	9
第二节 华人移民的本土环境经验与移民压力.....	10
赴澳移民本土环境经验的积累.....	10
移民输出地的生态与社会危机.....	13
第三节 华人卷入淘金热的过程.....	14
太平洋贸易网络与华人移民赴澳的条件.....	14
华人与维多利亚环境的最初遭遇.....	16
主要华人矿工进入矿区之路.....	18
第四节 对华人移民淘金活动的新分析.....	20
对既有结论的质疑.....	20
对淘洗废矿现象的深入理解.....	22
华人多样化的淘金方式与局限.....	25
华人水利技术在矿区的应用.....	27
第五节 对华人农业生产的全面理解.....	31
华人蔬菜种植业缘起再分析.....	31
华人蔬菜种植业的扩展、特点与影响.....	33
华人多样化的农业生产活动.....	36
第六节 论种族主义与华人生存环境的恶化.....	38
老问题再检讨.....	38
白人种族主义的逻辑悖论.....	40
种族主义与华人生存环境恶化之关系.....	41
小结 论淘金热中华人环境经验的散播、嬗变与边缘化.....	46

淘金热中华人移民的环境经验

淘金热爆发后十年内，澳大利亚总人口增长了近三倍，其中维多利亚人口爆增近七倍。仅参照官方的不完全统计，在 1857-59 年维多利亚殖民地的华人始终维持在 4 万人以上，他们成为金矿区仅次于白人的第二大移民群体。¹淘金热中也有少量来自美国的非洲黑人甚至澳洲土著矿工卷入，但与华人移民矿工相比，这些有色人种矿工仅构成极零星的个案。²如此规模庞大的华人移民群体不仅奠定了日后澳洲华人社会的根基，而且也注定了他们将对维多利亚殖民地的社会与环境产生重大的影响。就环境史研究来说，淘金热中华人移民的生产生活不仅关系到非西方外来经验在澳洲殖民地的传播与调适问题，而且当他们面对人数上占有绝对优势的白人移民群体时，还深深涉及到不同环境经验的交流与冲突问题。所以作为淘金热移民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华人的经验理应得到传统史学家的注意，也值得环境史学界、尤其是华语学界的分析。探索淘金热中华人移民的环境经验，不仅需要留意其在采矿活动中的经历，也要理解其本土经验的积累过程、还要关注其出发、抵达及多样化生产生活过程中的遭遇。如此不仅可以更加完整地理解维多利亚淘金热中移民活动的全貌，也有助于对比揭示生态环境因素如何与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共同塑造了不同人群的命运。

第一节 澳洲华人史研究的流变与环境史视角的提出

澳洲华人史研究崛起的历史背景

一个看似不合情理的现象是，虽然卷入维多利亚淘金热的华人移民在人数上颇为可观，但在澳洲学界汗牛充栋的淘金热史研究中，关注华人的成果一直屈指可数，以至擅长加州与澳洲淘金热史比较研究的安德鲁·马库斯评论说：“第一部系统研究十九世纪澳大利亚华人史的著作是 1923 年迈拉·威拉德 (Myra Willard) 的《白澳政策史》。……这本书回顾并解释了当时一系列重大的事件——它们导致澳洲最终采纳了一种排斥华人移民的政策。但此后近 40 年时间中，几乎没有任何后续研究。结果当这本书在 1967 年再版的时候，它仍然是当时唯一针对十九世纪华人的综合性研究。”³安德鲁的评论不仅反映了澳洲史学界对华人移民史研究的轻视，也警示了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那就是澳大利亚一直缺乏对白澳政策历史的反思。所谓白澳政策 (white Australia policy) 的基本含义是澳大利亚只属于白人移民。它在淘金热时代起源和发展，到 1901 年澳大利亚联邦建立时，通过三项立法 (《限制移民法案》、《邮电法案》与《太平洋岛屿移民法案》) 被确立为基本国策。这些法律杜绝了有色人种移民澳洲的可能，还对已经落户的此类移民施加置产就业方面的诸多限制。在 1901

¹刘涓平，《大洋洲华人史事丛稿》，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 年，第 28 页。；另见：“Legislative Council on the Subject of Chinese Immigration”, D.19, 17th Nov., 1857. *Victorian Parliament Legislative Council (VPLC)*, 1856-7.

²一些侧面的证据是，淘金热时代维多利亚立法议会罕有针对其他有色人种移民的决议，当地媒体报道中也极少见到其他有色人种移民的事迹。

³ Andrew Markus, “Chinese in Australian History”, *Meanjin*, Vol. 42, No. 1, (March, 1983). p.87.; Myra Willard, *History of the White Australia Policy*, Melbourne: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1967.

年后近 70 年的强化维持过程中，它演化成澳洲主流社会的一种意识形态，白人精英处处回避谈论澳洲历史上其他移民的影响力。这就导致华人群体不断被边缘化，华人历史无人问津。

1960 年代末期，亚太局势和澳洲内政都发生了变化，这决定了白澳政策在政治上的破产。从亚太局势看，英国在 1950 年初针对美国第四点计划而提出的“科伦坡计划”（Colombo Plan），要求英联邦国家中的发达国家通过资金和技术援助、教育及培训计划等形式来加强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十余年中，许多南亚及东南亚人进入澳洲接受高等教育与技术培训，实际上打破了澳洲禁止非白人移民的规定。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也掀起了世界舆论对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批判，以巴布亚新几内亚为首的澳大利亚“托管”大洋洲岛屿地区纷纷掀起自治独立运动，而澳大利亚因为对此态度消极而屡遭联合国点名批评。1966 年澳大利亚被迫签署了联合国《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此外，日本的战后复兴与东亚四小龙的崛起，也迫使澳大利亚无法回避北方邻国的影响力。从内政上看，1960 年代末起澳洲土著居民掀起了民权运动，这在白人青年中赢得了广泛支持，结果澳大利亚主要政党为了拉拢选民先后从党纲中删除坚持白澳政策的条款。1967 年，执政的自由党霍尔特（Harold Holt）政府组织公投，确认土著获得公民权。⁴最后，美国的立场进一步刺激了澳大利亚：随美国一起陷入越战泥沼的澳大利亚日益感到新中国是无法直接对抗的。到 1971 年时，澳大利亚发现美国都在悄然靠拢中国，它若要缓解自己在国家安全上的压力，就更必须尝试接触中国。结果在野的工党公开提出新党纲——废除白澳政策以及中澳建交。其党魁惠特朗（Gough Whitlam）于 1971 年主动访华并面见周恩来总理，次年他当选后就兑现了诺言。至此，白澳政策全面寿终就寝。

白澳政策的瓦解对澳洲整个学界产生了深刻影响——人们对中国及亚洲问题的兴趣猛增。1983 年，澳洲新当选的霍克总理任命史学家曼宁·克拉克为政府核心顾问，这位澳大利亚最重要的通史作家从此不余遗力地提倡反思种族主义史学。1991 年克拉克去世，基廷总理也接替霍克继任工党新任总理，而后者任命曼宁的助手沃特森（Don Watson）为自己的首席发言起草人，继续引导澳大利亚政学两界清算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在这种背景下，澳大利亚华人移民史研究环境空前宽松，华人移民史研究开始崛起。

澳洲华人史研究之流变

在了解华人移民史研究打破僵局的时代契机后，或许不难理解安德鲁在 1983 年对澳洲华人史研究的尖锐地批评。他认为在过去 30 年的有限研究中，华人总是被视为一种客观对象，学者们研究华人移民，其实最关心的是还白人社会对他们的反应。不过在这一主流外，也有个别学者将华人群体视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势力，依赖官方记录来总结其发展的内部组织特点。⁵这大体可算作澳洲华侨史研究的起点，可是由于澳洲官方材料较少涉及华人社会生

⁴参见刘樊德，《澳大利亚东亚政策的演变》，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年。第 122-123 页。

⁵ 这里关键的两个作品是：A. Huck, *The Chinese in Australia*, Melbourne: Longmans, 1968.; C.Y. Choi, *Chinese Migration and Settlement in Australia*, Sydney: Sydney University Press, 1975.

活的情况，早期移民本身又极少留下文字材料，结果十九世纪特别是淘金热时期华人移民的活动几乎无法被深入了解。比如华裔学者王省吾曾经尝试对早期华人移民澳洲的过程与组织做探索性研究，结果被安德鲁认为是立论薄弱，难以为继。⁶来自澳洲华人社会的资料直到1890年后才丰富起来，这是因为当时出现了华人自己办的报纸。华裔学者杨进发就利用这些材料结合官方档案完成了著名的《新金山》一书。不过这一研究虽然详尽而系统地展示了华人社会网络运作的全貌，可研究时间段仅是二十世纪的前二十年。⁷另外一个技术上的瓶颈在于，由于白人学者几乎不谙中文，结果许多中文资料和成果难以被安德鲁等澳洲学界新锐所了解。在此不可忽视的是，澳洲华人史的研究在汉语世界同样有所发展，不过这些研究相对更显零星和缺乏原创性。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学者刘达人与田心源合作完成的《澳洲华侨经济》，它算是华语学界中开拓性的作品。⁸尽管它涉及早期华人史的部分不多，却综合利用了海外学界研究的既有成果以及中国海关方面的史料，探索了十九世纪中国与大洋洲的海上交通贸易路线，为了解早期华人移民进出澳洲的路径与规模做出了贡献。此外以悉尼大学为学术基地的刘渭平也通过中文札记与随笔大大补充了中澳交流方面的材料。⁹在这些基础上，大陆学者张秋生完成了近年来最完整详尽的澳洲华人史通史作品——《澳洲华侨华人史》。本书建立在作者早年的一系列研究论文基础上，还利用了中文原始资料《华工出国史料汇编》中部分涉及大洋洲劳工的记录，较为全面地讨论了华人移民澳洲的原因、过程及影响。¹⁰但是这本书的重心明显更偏向现当代问题。

从上列作品中可以看到，澳洲华人史的研究在中英文学界都有所推进，但是多数作品要么是宏观概括，要么在时间段上偏重于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后的故事。可是一个基本事实在于，澳洲华人群体是在淘金热爆发后才激增的，随后因为遭受日复一日的严苛排斥而萎缩。大致从1881年开始澳洲华人绝对数量每年都在下跌，1901年联邦成立后新移民补充几乎中断，到1947年时华人口只剩下12000人，仅占澳洲总人口三百五十分之一。在1980年代后澳洲华人移民数重新开始快速增长，但其背景与经历都不可同日而语了。¹¹所以研究早期澳洲华人的历史绝不可忽略淘金热时代的问题，现实研究中厚今薄古的状况应该有朝更均衡的方向发展。这里不可否认的是，材料和视角上的双重局限一直妨碍着学者们的努力。从材料上看，在中文材料不可能充裕的情况下，如果只采用澳洲官方档案中涉及华人问题的有限决议及法案记录，则毫无深入探究淘金热时代华人经历的可能。从视角上看，既有研究即便以中澳交流为主题，也还是习惯于将澳洲内部的华人社会与白人社会剥离对

⁶Andrew Markus, "Chinese in Australian History", p.89.; Wang Sing wu, *The Organization of Chinese Emigration 1848-88*, Chinese Materials Centre, San Francisco, 1978.

⁷该书已经翻译——杨进发著，《新金山：澳大利亚华人（1901-1921）》（姚楠、陈立贵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英文原版为：C. F. Yong, *The New Gold Mountain*, Adelaide: Ralphael Arts, 1977.

⁸刘达人、田心源，《澳洲华侨经济》，台北：台湾海外出版社，1958年。

⁹刘渭平，《大洋洲华人史事丛稿》，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其自选文集为《小黎光阁随笔》，台北：三民书局，1992年。

¹⁰张秋生，《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年。；陈汉笙，《华工出国史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

¹¹郑嘉锐，“澳大利亚华侨、华人概况”，《中山文史》，中山：政协广东省中山市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第24辑，第11页。

待，或是强调官方政策对华人社会变化的影响，或是陶醉于探究华人社区内部的运作，结果轻视了华人移民与澳洲整体环境与社会的交流互动。这导致学界对一些重要的问题少罕有具体的回答，比如淘金热时代的华人移民、也就是澳洲最早的华人群体对澳洲社会的影响有多深？华人多大程度上能够融入澳大利亚整体的发展？其遭遇有何具体的表现、个中缘由又何在？不回答这些问题，澳洲史上的华人移民就摆脱不了过客（sojourners）的形象。

在英语学界，情况从1980年代起还是有了转机，标志就是凯瑟琳·克罗宁的《殖民地的牺牲品》一书。她不仅扭转了华人史研究中轻视早期移民经历的问题，而且试图探讨华人与白人移民互动的机制。这本书强调了淘金热中华人与白人移民的交流、特别是华人对白人移民活动的反应。不仅如此，这一研究大量利用了维多利亚淘金热时代的报刊媒体资料，一举扭转了既往研究只依赖官方档案的材料局限。澳洲华人史研究从此更注重发掘社会史材料，藉此探索早期华人移民经历的复杂性。从此相关的个案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华人研究也日渐被澳洲主流史学界所认可。比如2004年《澳大利亚殖民史研究》发表了专号：“积极的声音，湮没的历史：澳洲殖民地时代的华人”。而2011年，澳洲史学界最权威的刊物《澳大利亚历史研究》也刊发了专号：“龙之尾：重新阐释澳大利亚华人历史”。¹²其中都有许多代表着研究最新动向的论文。从相关成果上看，这些丰富的个案分析大大拓宽了人们对早期华人移民活动的观察视角，它们展现出白人与华人移民之间有许多互动交流，华人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而是有各种不同的组织和斗争。具体涉及的新议题包括华人与欧洲移民的联姻、基层司法纠纷、甚至还有早期华人对澳洲重大政治运动的参与等等。在针对淘金热时代的相关研究中，瓦莱丽·拉芙乔（Valerie Lovejoy）、巴里·麦戈文及基尔·里夫斯利的成果格外最值得重视。他们利用华人矿工的死亡记录、遗书、法庭卷宗、考古遗迹等描绘了故乡传统对华人移民的羁绊，展现了许多底层华人在澳大利亚谋生的复杂感受，¹³借助材料和视角的创新，他们颠覆了淘金热时代华人移民是过客的刻板形象，也修正了克罗宁有关华人总是沦为殖民地牺牲品的消极被动形象。¹⁴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华人移民曾积极推动了淘金热的发展，贡献了许多白人移民难以达到的成就，而白人种族主义的发展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华人与白人的互动是复杂纠结的。所以，既不能用过客的概念来分析华人，也不能用“同化叙述”（assimilation narrative）来描绘他们扎根澳洲的过程。¹⁵总之，华人在淘金热中的主体

¹² “Active Voices, Hidden Histories: The Chinese in Colonial Australia”, *Journal of Australian Colonial History*, special issue, vol.6, (2004).; “Dragon Tails: Re-interpreting Chinese Australian History”, *Australian Historical Studies*, vol.42, no.1,(2011).

¹³ 参见: V. Lovejoy, “Depending Upon Diligence: Chinese at Work in Bendigo 1861-1881”, *Journal of Historical and European Studies*. Volume 1, (December, 2007), pp.23-38.; “The Things that Unite: Inquests into Chinese Deaths on the Bendigo Goldfields 1854-65”, *The Journal of Public Record Office Victoria*, no.6 (Sept,2007),pp39-56.; Keir Reeves, “Goldfields Settler or Frontier Rogue? The Trial of James Acoy and the Chinese on the Mount Alexander Diggings”. *The Journal of Public Record Office Victoria*, Number 5, (September 2006), pp.1-13.

¹⁴ Barry McGowan, “Reconsidering Race: The Chinese Experience on the Goldfields of Southern New South Wales”, *Australian Historical Studies*, Vol.39, Issue, 124, pp.312-331(2004); “The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of Chinese Mining in Colonial Australia”, *Austral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45.No.2,(July 2005),pp.119-138. Keir Reeves and Benjamin Mountford, ‘Sojourning and Settling: Locating Chinese Australian History’, *Australian Historical Studies*, Vol.42, No.1, (2011),pp.111-125.

¹⁵ Valerie Lovejoy, “Chinese in Late Nineteenth-Century Bendigo: Their Local and Translocal Lives in ‘this

性与能动性得到了学术界的平衡关照。

淘金热华人移民史研究的环境史视角

根据上述认识，推进淘金热时期华人史研究的关键在于深入阐发当时华人移民的活动细节以及如何将他们的经验放置到跨文化交流的背景下看待。这关系到他们同白人移民合作或冲突的根本动因与后果。在社会史研究素材不断丰富过程中，华人与澳洲环境互动的经验得到了特别关注。恰如基尔与巴里等人所推崇的物质文化方法所提示，环境史新视角与新材料的配合可以让学界更全面地理解华人移民在淘金热乃至澳大利亚历史中的影响，促成《澳大利亚历史研究》提出的一种“澳大利亚历史的华人叙事”（Chinese Narrative of Australian History）。¹⁶

具体来说，美国环境史学家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的两部著作《哥伦布交换》与《生态扩张主义》提供了绝佳的启示。在这些研究中，阿尔弗雷德令人信服地展现了殖民者引起的生态要素交流如何塑造了现代世界的走势。¹⁷他非常重视环境经验的传播与影响问题，认为欧洲殖民者在世界温带地区拓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殖民者有意无意地把欧洲生态体系与环境治理经验复制到了新大陆。尽管克罗斯比的研究没有包括澳大利亚的个案，从而也不可能涉及维多利亚殖民地的问题，但就环境交流的过程和后果来看，其理论是适用于此地的。淘金热导致的大量人员物资流通无疑促成了包括人群在内的生态环境要素的交流。与克罗斯比侧重欧洲经验与土著经验的交流不同，受到其启发的学者伊安·泰利尔（Ian Tyrrell）着重分析了澳洲与加州的环境交流，而这正是由两地的淘金热所引起的。他发现这两地的物种和环境治理技术有多样化的交叉取舍，结果导致了景观的变迁与社群的重组。¹⁸伊安的研究极富突破性，因为他将生态环境交换的关注点从大西洋沿岸推向了太平洋地区，而且把澳大利亚列入了考察的一个中心。他也明确提示了学界要注意十九世纪中叶的淘金热深深涉及不同环境经验的传播问题。事实上，维多利亚“淘金热移民为英国人提供了非比寻常的体验，他们中许多人从未如此自由地与外国人混杂一处，特别是跟中国人在一起。”¹⁹是故对于维多利亚淘金热所创造的环境交换契机而言，除了白人经验与当地环境的互动，白人经验与华人经验的交流同样是一个重大主题。所以本章研究的核心问题也就是淘金热中华人移民如何在嵌入维多利亚环境的同时与白人移民的经验交流，而这种交流

strangers' Country", *Australian Historical Studies*, vol.42, no.1, (2001), pp.45- 61.

¹⁶ Keir Reeve and Tseen Khoo, "Dragon Tails: Re-interpreting Chinese Australian History", *Australian Historical Studies*, vol.42, no.1,(2011),pp.4-9.

¹⁷ Alfred Crosby, *The Columbian Exchange: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1492*, Westport: Greenwood Publish, 1972; *Ecological Imperialism: 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 900-190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这两本书均已有了中文版：《哥伦布大交换：1492年以后的生物影响和文化冲击》（郑明萱译），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年；《生态扩张主义：欧洲900-1900年的生态扩张》（许友明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

¹⁸ Ian Tyrrell, "Peripheral Visions: Californian-Australian Environmental Contacts, 1850s-1910",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 8, No. 2. (1997). 在此基础上他发表了专著：*True Gardens of the Gods: Californian-Australian Environmental Reform, 1860-193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¹⁹ Charles Fahey, "Peopling the Victorian Goldfields", p.149.

又如何影响了他们的未来命运。

从材料利用方面看，澳洲华人史研究近年来新发掘的材料已经为这种环境史视角提供了扎实的史料基础。除了那些涉及华人移民与矿区环境互动的研究，淘金热时期的农业史材料也提示了华人与澳洲土地的多样化互动。²⁰考古学成果则补充了人们对矿区华人移民日常工作及生活条件的精确了解。²¹即便是对传统研究所倚重的官方档案也有发掘的潜力：面对澳大利亚是英国殖民地的基本事实，在发掘官方档案的过程中，不应只关注澳洲方面的档案，还应该关注英国方面的记录，而这里确有意想不到的发现。显然，如果整合既有研究、发掘新发现的档案记录、报刊媒体资料以及中文材料，以环境史视角重新考察华人移民参与淘金热的全过程是完全可行的。

第二节 华人移民的本土环境经验与移民压力

赴澳移民本土环境经验的积累

不了解华人移民在故土的生活环境与生产经验，就难以理解他们在万里之外的淘金热中会应用何种基本生存法则与技能。对英语学界的职业研究者来说，这方面的问题是长期被忽视的，最多不过是一种对侨乡人居环境的背景介绍。²²而对于当下的研究而言，必须明确的一点是，华人移民的故土环境并不是静态的背景因素，而是深深渗透进他们日常活动的。当地人在改造环境的时候，也培育出了自己的环境调适能力，这是他们在海外生存与发展的基础。那么华工的主要输出地何在？众所周知，大批华人出洋务工是鸦片战争之后通商口岸地区率先涌现的，其中以珠三角与厦门为中心，前往澳洲的移民亦不例外。维多利亚淘金热甫经爆发就有华人卷入，这些矿工大体来自福建厦门地区。不过厦门华工移民规模相对微小，从未成为淘金热华人移民的主流。华人移民成批涌入维多利亚矿区是 1853 年之后的事情，而维多利亚地方议会的档案最早谈到华人移民问题是在 1854 年，里面明确指出在淘金热进入高潮后华人矿工绝大多数来自珠三角的四邑地区。²³所谓的四邑，并不是一个实际的政治地理区划，而是四个文化与环境相近的区县之统称，包括今天广东省江门市下辖的台山、新会、开平与恩平。²⁴综上可知，本章最关注的应是上述地域的本土经验。

²⁰ 参见 Colin Webb and John Quinlan, *Greater Than Gold: a History of Agriculture in the Bendigo District from 1835 to 1985*, Bendigo: Cambridge Press, 1985.; Warwick Frost, "Migrants and Technological Transfer: Chinese Farming in Australia, 1850-1920", *Austral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42.no.2, (July, 2002); Zvonkica Stanin, "From Li Chun to Yong Kit: a Market Garden on the Loddon, 1851-1912", *Journal of Australian Colonial History*, Vol.6, (2004).pp.14-34.; Cora Trevarthen, "After the Gold Is Gone: Chinese Communities in North-East Victoria, 1861-1910", *Journal of Chinese Australia*, Issue.2 (October, 2006).
<http://www.chaf.lib.latrobe.edu.au/jca/issue02/09Trevarthen.html>

²¹ 这里最重要的代表作是基于新南威尔士州殖民地南部而非维多利亚殖民地金矿的，但由于两地环境类似，所以研究成果具有跨越行政疆界的说明性。参见：Barry McGowan *Dust and Dreams: Mining Communities in South-east New South Wales*, Sydney: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Press, 2010. 此外，基尔还进行着一个专门调查华人淘金遗迹的项目“澳大利亚殖民时代的华人景观”(Down at Street Level: Chinese Landscapes from Colonial Australia)。

²² Eric Rolls, *Sojourners: Flowers and the Wide Sea*, St. Lucia: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 1992.chapter one.

²³ 最早涉及华人移民的讨论散见于 1855 年的记录，但所涉及的议题是 1854 年的事情。有关华人移民最集中的讨论，参见：“Legislative Council on the Subject of Chinese Immigration”, D.19, *VPLC*, 1856-7.

²⁴ 现在与此近义的地理名词主要还有“五邑”，即以上四个区县之外再加上鹤山县。

无论是四邑还是厦门，均处于热带或亚热带地区，同时也处于东亚季风带，气候条件与生态环境迥然不同于维多利亚殖民地。但是生长于这种环境下的中国劳动力从一开始就深得英国殖民者青睐。1852年，英国驻厦门领事曾报告说：“厦门人很适合在热带地方做工，本地夏季的炽热阳光，其炎热程度恐怕是中国其他地方所罕见的。工人们在田里操作时虽在盛暑头上也不戴帽子。中国人比马来人更不易于受热病的侵袭，也较少受到霍乱的传染。……厦门的（农业）工人必须会播种、收割、犁地、灌溉和施肥。总之，他应当会种植稻、麦小米、玉米、花生、豆类、蔬菜、姜、甘蔗、瓜、茄子等等。”²⁵显然，这里的评论说明当时潜在的厦门移民基本为农民，他们能够娴熟掌握全套耕作技术并且擅长多种亚热带农作物的培植工作。不仅如此，无论是出于被逼无奈还是体质彪悍，厦门人能够忍受酷暑高温的折磨，而且还不宜患消化道疾病，这在拓荒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素质。这个优势很可能是因为华人普遍习惯饮用煮沸的水，而马来人则和多数东南亚居民一样，传统上喜欢直接饮用天然水，哪怕事先经过沉淀。²⁶面对澳大利亚东南部荒野常年骄阳普照、夏季高温缺水的现实，英国驻华外交官眼中的厦门人似乎符合理想标准。

再看赴澳华工最主要的输出地广东四邑。相比与厦门，这里的自然环境更符合典型的热带季风气候特征，而且农业生产技术与条件更加成熟复杂。四邑地区处于珠三角冲积平原，地势北高南低，地貌以丘陵为主，河渠纵横，平地零碎分布，自然植被丰茂。此地年平均气温在 23 摄氏度左右，年降雨量最低也在 1000 毫米左右。在这种宜人的湿热条件下，四邑地区农民在十九世纪时已经形成了颇为精妙而高产的农业生产体系，多样化的种植与养殖活动引人惊叹，首先最出名的就是桑基鱼塘。所谓桑基鱼塘就是为充分利用土地而创造的一种挖深鱼塘，垫高基田，然后在基田上种植桑树、塘内养鱼的立体人工生态系统。桑基鱼塘是池中养鱼、池埂种桑的综合养鱼方式，蚕粪可做饲料，而定期挖掘鱼粪池泥又可肥田，是典型的高效有机农业生产方式。²⁷此外还有轮作制度，即每年种两季水稻，间种蔬菜与红薯。²⁸十九世纪下半叶，四邑的蔬菜种植业已经影响重大，品种达到 30 多种，供应到广州、佛山等大城市。²⁹水果种植业也是另一项重要的农业生产活动，比如新会的橘子产量大、品质好，1840 年时已经成为清廷的贡品。此地还特产蒲葵，名声甚盛。³⁰这都证明四邑农民农业生产的多样性。其次，这里的生产技术是充分适应当地自然条件而发展起来的，这主要练就了四邑人出色的治水技术。四邑地区虽然雨水充沛，但降水也有季节分布不平衡现象，春季降雨期的延长与台风雨都可能导致水灾。此外丘陵密集、河网细密、沿海地势低洼的地理特点也加剧了水灾的威胁。为了生存，这里的水利建设任务非常繁重。比如台山县在清朝中后期就

²⁵ 陈汉笙，《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二辑），第 13 页。

²⁶ 安东尼·雷德，《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季风吹拂下的土地》（吴小安、孙来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年。第 45 页。

²⁷ 这一生产模式非常出名，以致于最早涉及澳洲华人移民矿工史的学者都有所注意。参见：Jean Gittins, *The Diggers from China: The Story of the Chinese on the Goldfield*, Quartet Book, Melbourne, 1981. 第 18 页。

²⁸ 《江门市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600 页。

²⁹ 《新会县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308 页。《台山县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268 页。

³⁰ 《新会县志》。第 285、297 页。

人工修建了“蛮陂头渠”，它从山里出发，曲折十余里，西流猴岭，斩截山脉，转折分流，注于锦坡朗，灌溉 1000 多亩土地，而且渠、圳（田边环绕的水沟）密布。³¹除桑基鱼塘，沿海低洼地区居民为了适应环境还发展起注重疏导内涝和保持土壤肥力的农田生产体系。著名学者梁启超作为四邑新会人，曾对家乡种植柑橘留下一段生动的描绘：

“植物之大宗者。艺谷之外。曰桑。曰菸叶。曰蒲葵。曰柑橘。曰橙。……老农为余言。……吾县濒海。凡种植家皆筑围以避潮。围内为塹。资畜泄焉。此为第一义。其费每亩为二两四钱。犁地为界。界有小濠。此为第二义。犁地之费。每亩八钱。开濠如之。买树为第三义。每树一株。值银三分六厘。每亩之费。为五两四钱。吾县之田。每年中价。二两四钱而赁一亩。其初植之第一年。田主重征之。率亩而加三两焉。此为第四义。都其总数。初植之第一年。凡亩而费十四两八钱。一切备矣。橙五年而实。向言亩值五百四十两有奇者。六年以后之事也。老农又为余言。田艺谷既久。其土涂於新树最不利。而番薯最宜。故第一年必植薯。植薯之利。每年可三两六钱。新树畏烈日。自第二年至第五年。必间岁植蔗及瓜豆芋粟之属以捍蔽之。植蔗之利。年可二十两。植瓜豆之利。年可十四两。其视艺谷所获。已一倍至二倍矣。围堤内外。树以杂果木。堤外二排。一蒲葵。二水松。堤内三排。荔枝桃李柏间树之。塹可以畜鱼。濠可以艺禾。橙下余地。可以植蔬。……治田之工。每百亩仅用四人。惟植橙用工特少橙熟收实时则雇散工耳每年中价。人约十二两。一切取之於围堤濠塹所出之物。恢恢然有余矣。故植橙百亩者。”³²

这一段信息量丰富的记录将极大帮助人们理解四邑移民在维多利亚淘金及农业种植活动中所采用的技巧与工作风格。显然，四邑农民普遍擅长修筑堤坝以及水渠用以引水和排水，而且水利设施的修建是灵活通变的。不仅如此，他们熟悉掌握土地肥力的变化，懂得不同肥力的土壤适合不同的作物，也能利用有机肥料改良土壤。最后，他们将轮作的技能发挥到极致，在培育果树直到收获的周期中几乎种植了所有可以耕作的其他农作物。毋庸置疑，四邑移民同样是出色的农业生产者，这将大大增加了其海外拓荒的竞争力。后文将展示在维多利亚淘金热中，华人移民的水利技术和蔬果种植技术会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周围的环境并且满足整个殖民地社会发展的需要。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有澳洲学者曾经认为华人在淘金方面的某些成功可能与他们早已拥有采矿经验有关。³³但仅就四邑的自然禀赋而言，这似乎不太可能。因为首先这一区域唯一曾经发现具有可采价值的浅层金矿坐落在恩平县，虽然历史上偶尔有人在此淘洗金子，但直到 1930 年才有重大发现。³⁴此外，在维多利亚淘金热爆发之前，这里有一定开采价值的矿产主要是石灰石等非金属矿，利润率低且不足以形成支柱性产业，也就催生不出大量矿工。总之，这些侧面的例证更加说明对四邑移民而言，在海外的环境改造经验基本都源于其在故

³¹ 《台山县志》，第 294 页。

³² 梁启超，“说橘”（1896 年），《饮冰室合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9 年。第 114 页。

³³ Geoffrey Balainey, *The Rush that Never Ended: A History of Australian Mining*,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84. first published in 1968.

³⁴ 《恩平县志》，广州：广东省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151 页。

乡的农业活动传统而不是工矿技能。

移民输出地的生态与社会危机

仅从文书上看,1860年《北京条约》后华工出国才正式获得了制度合法性。“咸丰十年正月二十七,两广总督劳崇光准许各国招工出洋照会。”“十月二十四日,《北京续增条约》第五款,许华人出洋承工。”³⁵但在此之前,大规模的华人出洋活动已经开始。对此,既往研究大多强调殖民主义贩卖人口的罪恶,但淘金热华人移民的内在动力同样不能忽视。事实上,张秋生对华人移民的内外因互动已经做出了较为完备的分析。³⁶这里在补充史料细节的情况下还需强调一个论断,即在十九世纪中叶中国移民输出地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而且这种危机与社会矛盾交织恶化,最终促成了向海外移民的动力。首先是人口与土地的矛盾:从十九世纪以降,福建与广东已经面临前所未有的人口爆炸问题,这导致当地生态压力急剧增加。据1930年代的材料回顾,在晚清时中国人口过剩最多的四个省份中广东和福建分列冠亚。广东人口密度每平方英里363.7人,一户农民平均有12亩地,地价也是全国最高。而福建人口密度是每平方英里208.49人,每户农民平均有14亩地。³⁷1661-1812年,福建人口增加9倍,耕地只增加了32%,而广东人口同期内增加了20倍,土地却仅仅增加了27%。³⁸这一时代出现以较少土地承载大量人口的状况不仅是因为中国农业发展中所谓的“过密化”现象,也是因为新作物的引种,而这又与欧洲海外殖民活动引发的物种传播有关:源自拉美的高产粮食作物如红薯等在华南沿海地区受到普遍欢迎和推广,结果大大提高了单位土地面积的人口容纳力。可是,人口的增加反过来又将土地的开垦推进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薛福成评论十九世纪下半叶珠三角地区的农业开发时说:“生计之艰,日甚一日……,凡山之坡、水之浒,暨海中沙田、江中洲泚,均已悬无余……竭一人终岁勤劳动之力,往往不能仰事俯蓄。”³⁹就是这种状态下,土地分配还极度不平衡。当时占四邑人口5%的地主却拥有当地60-70%的耕地。而占人口60%的底层农民只拥有9%的耕地。结果四邑地区在十九世纪中叶业已面临严峻的粮食不足问题,如当时在拥有60万人口的台山县,粮食收成只能维持半年所需,而在新会,60-70%的大米已经需要从海外进口。⁴⁰这种现实大大颠覆了珠三角地区是鱼米富足的传统形象。

在人口对生态环境的压力开始超过极限时,一旦发生不可抗的环境灾害必然导致灾难性的生存危机,孰料它们偏偏接踵而来。在维多利亚淘金热爆发后的1852年、1856年、1861年、1864年及1866年,四邑地区连续遭遇了罕见的洪灾。典型的情况往往是夏季台风毁坏了基本农田水利设施,同时台风雨也加剧了春雨季延长导致的地表径流过剩问题,诚可谓一

³⁵ 参见贾祯,《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67,第13-17页,转引自陈汉笙,《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第9-12页。

³⁶ 张秋生,《澳洲华侨华人史》,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年。

³⁷ 陈汉笙,《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四辑),第478-479页。

³⁸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6-9页。

³⁹ 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光绪十七年),载于陈汉笙,《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四辑),第569页。

⁴⁰ 梅强伟、张国雄,《五邑华侨华人史》,广州:广东高等级教育出版社,2001。

波尚未平息，一波又来侵袭。但此时既有湿地的泄洪能力由于开垦过度而急剧下降，结果四邑粮食生产反复歉收甚至绝收。⁴¹这种灾变过程与日后中国长江流域的许多洪灾情况非常类似。可麻烦还没有到此为止——很大程度上正是为了争夺当时日渐萎缩的生态资源和生存空间，四邑社会不同人群之间的矛盾也急剧爆发，这里就牵出了土客矛盾问题。土客矛盾从来都不仅是生态矛盾，可是在 1850 年代，土地分配不平衡以及自然灾害引发的物资紧缺状态大幅加剧，于是土客争端也随之激化。⁴²1851 年 1 月，维多利亚淘金热爆发之前六个月，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两广震撼。当时广东地方政府普遍面临财政危机，行政治理也出现涣散态势，结果它们不仅缺乏赈灾和协调社会矛盾的能力，甚至都无力以常备军抵御随时会逼近的起义。于是政府纷纷临时招纳平民组建民团抵御起义军，其中客家人更为积极踊跃。1854 年，四邑响应太平天国掀起了红巾军起义，本土居民积极响应，包围了几个县城，大量客家人却加入民团帮助政府守城。到 1856 年，起义蔓延成为针对客家人的暴力劫掠与复仇，而客家人也竭力反击，最终武装冲突持续扩大，整整 12 年才平息。这场战争的严重性不可低估，比如台山县人口就减少 10 万之众，许多村落化为废墟，基础设施严重损毁，生产效率进一步降低。⁴³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人口减少并不都是因为伤亡和逃难，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交战双方都喜欢把俘虏充作劳工贩卖海外，其大体目的是要借此削减对方青壮年男性人口数量，瓦解对方的战斗力。⁴⁴这样，除了经济生态压力直接导致的移民外，许多居民也沦为生态危机的间接牺牲品。

综上所述，华人移民输出地与维多利亚矿区的生态条件不尽相同，当地居民在长期适应本土环境的过程中，发展起了高度复杂发达的农业生产体系，这使得他们具有强大的自然环境改造力和适应力。移民区的社会生活也是深深植根于当地生态体系的，当生态条件恶化、自然灾害加剧以及社会秩序混乱交叠影响时，一股向海外移民的强大动力势不可挡地形成了。1840 年代四邑地区已经开始流传顺口溜，议论“春天出去，冬天可以回来，捞一两百个大洋银，不就可以成个家？”、“不跑远程，有了金山银山，也不会流进你的口袋”。⁴⁵可以说华人移民与白人移民虽然都是为了搜集财富而投身淘金热，但前者从一开始就背负着更多的求生压力。

第三节 华人卷入淘金热的过程

太平洋贸易网络与华人移民赴澳的条件

既然维多利亚淘金热爆发时华人移民的内在动力已经非常强劲，那么他们又是如何抵达了澳洲呢？相比从西欧出发，以厦门或珠三角港口为基地前往澳大利亚的海路要缩短一半

⁴¹ 《江门市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139 页。

⁴² 有关土客械斗近年来最详尽出色的史学成果可参见：刘平，《被遗忘的战争：咸丰同治年间广东土客大械斗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年。

⁴³ 黄道记、刘重民，“台山人涉外交往与出洋溯源”，《台山侨史学报》，第 1 期，1989 年 11 月。第 7 页。

⁴⁴ 刘重民，“鸦片战争对侨乡的影响”，《台山侨史学报》，第 2 期，1990 年 11 月。第 3 页。

⁴⁵ 陈焕明，“华侨之路”，《恩平文史》，第 15 期，1989 年。转引自梅强伟、张国雄，《五邑华侨华人史》，第 35 页。

以上，但这也绝不是易如反掌的。事实上，华人从家乡前往矿区，遭受的环境挑战更甚，当然这也反衬出华人移民的适应力。在此，还需首先明确华人卷入维多利亚淘金热的交通条件。

中国与澳洲东南部殖民地之间隔着星罗棋布的东南亚群岛及广袤的西南太平洋海域，若没有足够通畅的海上交通线与可靠的远航技术，即便沿海大量过剩人口愿意出洋，也难以实现如此长途的迁徙。在此，西方尤其是英国殖民者打造的近代太平洋贸易网创造了运输上的可能性。英国殖民澳洲的头一年（1788年）就有东印度公司的3艘船只从悉尼前往了广州，它们采购了满仓的中国货回欧洲，中澳正式通航了。⁴⁶我国亚太史研究的先驱何芳川曾精辟地概括说，到十九世纪中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最终形成，近代太平洋贸易网也最终形成。而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太平洋贸易网是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的网络。⁴⁷具体到中澳航线而言，一般是英国轮船自英国装运移民、杂货来澳，然后由澳洲装运煤斤、檀香木料、海味和兽皮输往中国，再由中国装载茶叶、丝绸取道澳洲、印度返航英国。所谓飞剪号（Clipper）的快速帆船，往来中国与澳洲之间，交通颇为频繁。⁴⁸

正是得益于这种背景，环太平洋淘金热爆发前后，苦力贸易也崛起为太平洋贸易网络中的重要内容，华人劳动力被大量输出到环太平洋的大陆沿海区、南太平洋群岛及加勒比海从事种植业与矿业开发，其中前往澳洲的华工也成为十九世纪下半叶华人大离散（Chinese Diaspora）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⁴⁹有关华人移民前往澳洲的航线，可以确信的起点有三个，分别是厦门、香港与新加坡，线路则有五条，最少需要80天，最多需要120天。⁵⁰除了路线问题，航行的季节与旅途条件也是值得注意的。英国驻华外交官很早就指出，“移民出洋应当在每年11月初至次年3月初举行。首先是因为这是季候风（东北季风）对航行最有利的季节。其次因为农村的收获季节已经过去，人力闲散比较容易招集。”⁵¹这个季节正是中国南方沿海相对湿润的冬季，可南半球的澳大利亚则处于最高温酷暑的时节，于是许多华人冬季出发后，在接下来至少三个月的行程中不仅要面对赤道热带的挑战，还要遭遇到导致天气越来越干旱的南半球副热带高压，甚为煎熬。这种困境还会因为英国商人的违规海运而加剧。英国航海法规定是每位乘客平均需要有12平方英尺的空间，每2吨准许载一个人，可为了提高利润，去悉尼的船只在运输华人时居然敢比规定单位少447吨。航海中，船主只雇佣中医甚至不配备船医。而且为了降低成本，运输商一旦出发就不愿意中途停靠海港，全程所需物资都靠出发港补给，这使得华人移民澳洲航线虽短，可是乘客痛苦更深。有去悉尼的移民船就曾因为所带淡水不够，中国乘客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死掉70多个。⁵²当然这里也

⁴⁶ 李长博：《中国殖民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222页。转引自张秋生，《澳洲华侨华人史》，第43页。

⁴⁷ 何芳川，“太平洋贸易网与中国”，《世界历史》，第1992年第6期，第70页。

⁴⁸ 参见：刘达人、田心源：《澳洲华侨经济》，第21页。

⁴⁹ 极具价值的英文文献可参阅：Kay Saunders, *Indentured Labour in the British Empire, 1834-1920*, London: Croom Helm, 1984.; Yan qinghuang (颜清煌), *Coolies and Mandarins: China's Protec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During the late Ch'ing Period (1851-1911)*, Singapore: 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1985.

⁵⁰ 张秋生，《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史》，第70-71页。

⁵¹ 陈汉笙，《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二辑），第4页。

⁵² 陈汉笙，《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二辑），第18页。

要修正传统研究里的一些夸大推论。《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史》曾根据当时中国前往美洲苦力船的旅行死亡率来推断前往澳洲航线的死亡率，这不一定适用于直航维多利亚殖民地的情况。现在参照一直被忽视的维多利亚议会档案中入境人口健康报告看，以淘金热进入最高潮的1855年为例，上半年共有25艘华工船入港，平均是1.75吨载一人，接近英国法律规定。体检记录有7920人入境，而路途中死亡30人。下半年则有11艘船运来2601人，死亡12人。⁵³考虑到英国商人不会因华人死亡而受到澳方惩罚，瞒报没有必要，所以这里显示的死亡率是明显低于中国至美洲的航线的。这一方面是因为英国运输商人相对更有人性，但更是因为中澳航线绝对里程更短。

从以上材料中可以看到，在淘金热时代，沿海华人向澳洲移民的地理瓶颈已经被彻底打破，去澳洲不再是遥不可及之事。此中关键是西方殖民者建立了有利可图的太平洋贸易网络，但是在自然条件及船主人为制造的困难下，华人前往澳大利亚仍然是一件具有风险的事情。当然，航行本身就考验了他们对新环境的适应力，淘汰了其中最羸弱的个体。

华人与维多利亚环境的最初遭遇

华语学界曾经耗费许多精力考证出华工最早抵达澳洲的具体时间是1848年10月2日，甚至有人力图论证在土著之后最早抵达澳洲的外来航海者是华人。⁵⁴这些问题并非毫无意义，但是纵观世界近代历史，其最大特点在于人类文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东西半球及南北半球加速碰撞和交融，而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才是根本动力。在个大前提下，有关早期华人抵达澳洲的重大问题或许是华人何时对澳洲大陆及白人殖民地社会产生了影响。仅从英文档案来看，作为水手和勤杂工的华人很早就抵达过澳洲，仅1846-1848年初明确记录的就有23人。但1848-1849年首次出现了悉尼输入华人劳工的记录，人数累计达390人。⁵⁵这些华人是由英国商贩给农场主运来的契约华工，他们从厦门出发抵达澳大利亚东南部殖民地。所以华人有组织地出现在澳洲殖民地是1848年无疑。尽管直到1853年初都有这样的厦门华工抵达，可累计总人数究竟有多少已经难以厘清。这是因为中国出港、澳洲抵港以及美国档案中的旁证材料都不一致，所以经过综合比对，目前较为可信的结论是在1848-1853年间至少有3000华人工人抵达澳洲殖民地。所以在淘金热爆发之前，已经有一定规模的华人在澳洲驻留，其中就有人卷入了最初的维多利亚淘金热。

根据传统研究普遍参照的澳洲海关记录，华工都是被运抵悉尼的，而悉尼一带距离维多利亚主要金矿有700公里以上，在新南威尔士也爆发淘金热的情况下，华工没有理由舍近求远。但是在查询英国上议院档案后可以发现为前人所忽视的记录，其中反映出1848年维多利亚也接受了一批华人移民，而且他们很快闹出了轰动性的事件，最终结局则使得他们有机会卷入维多利亚最初的淘金热。⁵⁶原来，尽管新南威尔士殖民地自1830年代进入了牧羊

⁵³ "Voyage Health Report", PT1-2., *VPLC*, 1856-57.

⁵⁴ 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具体可参见张秋生《澳洲华侨华人史》第一章与第三章

⁵⁵ 张秋生，《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史》，第52-53页。

⁵⁶ 无论是陈汉笙《汇编》收录的中英文史料还是张秋生等后继学者的论断，都是根据香港海关档案及新南威

业大繁荣，可仍然没有摆脱囚犯殖民地的身份，所以在无法吸引母国自由移民的情况下，它迫切需要解决劳动力紧缺的问题，于是牧场主们就求诸当时已经渐成气候的华工贩运贸易。1840年代，尚未从新南威尔士独立出来的菲利普港殖民地（维多利亚殖民地的前身）也日益面临牧业发展和劳动力短缺的矛盾。结果1848年从厦门运来的劳工中并没有全部落户悉尼地区，其实还有120人在当年12月8日被运到了菲利普港殖民地。新南威尔士总督在送交英国首相格雷（Earl Grey）的信件中说：“这些华工的输入是个人行为，官方没有给予任何支持性表态，相反，政府断然拒绝了所有要求对此进行援助或奖赏的申请。但是我还得确切地说一句，在悉尼地区，所有抵达的中国人都很轻松地赢得了尊敬，还被雇用为仆役、花匠和牧羊人，颇为有益。总体上说他们无疑是一群无害的人，这令雇主很满意。但在菲利普港地区，……某些情况恰恰相反。”⁵⁷

究竟怎么回事呢？原来是维多利亚的气候让第一批抵达这里的华工无法适应。12月8日正值此地盛夏，华工冒暑为牧场主进行开荒、平整地面及牧羊的工作，但是紧接而来的秋冬异常寒冷，这些华工毫无准备，多数人坚决脱离了原有岗位，进入城市求生，但又没有收容之地，结果许多人被当局视为无业游民而收入监狱，迅速出狱后又只能流落街头，乞讨度日，引起了公众担忧。菲利普港殖民地首府墨尔本的市长给驻扎此地的新南威尔士副总督拉·脱伯（La Trobe）连续两次详细报告说：“在这样一个绝不适合人类暴露在室外的季节里，尤其是在那样一种贫困至极的状态下，这些人游荡在公共街道上。……这些人本来就只适应更温暖的气候，可他们出狱后，在这个殖民地、在这个如此之冷的季节，住宿条件如此不济，食物补给如此不定，他们的健康显然大大受损。……人们极其担心这样的移民一旦多了就会给公众导致长久的负担，不管是因为这里的气候比他们老家的更严苛，还是他们根本就不适合做那些活儿。”随后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墨尔本市市长劝华工回到原来岗位，可是最终他在信件里灰溜溜地记录说：“他们（华工）是主动脱离那些岗位的，而且坚决不肯回到原职上去，一个最根本的理由是，这里天气太严苛，他们根本无法胜任荒野里的牧羊工作，尽管他们说雇主们在各方面都还善良。”⁵⁸最终结果是市长建议成立一个临时收容所让其居住下来，任其择业。

这段史料给予读者许多重要的信息。由于地势与维度更高的因素，墨尔本以北地区冬季低温可以比悉尼一带低10度左右，换季温差也远高于悉尼。初来乍到的华工马上被投入开荒活动并且还承担牧羊的工作，面对阴冷的寒冬他们不可能有所准备，其工作难以再尽职尽责。相比较而言，在气候温和的悉尼，同样批次的华工承担同样的工作就没有出现擅离职守的情况。更何况据资料显示，当时这些契约华工的待遇是“成年人每周银元2元5角，男

尔士殖民地的档案来确定华人的抵达港，可他们都忽略了菲利普港地区当时的历史现实：这里处于半独立状态，有许多情况是经澳洲总督直接汇报英国内阁而未见得收藏于海关档案的，特此说明。

⁵⁷ “Governor Sir C.A. Fitz Roy to Earl Grey. 3 Oct. 1849”, no.1, *Accounts and Papers (AP)*: Session 4 Feb.-8 August 1851, Vol. XL, 1851.

⁵⁸ “M. Bell to La Trobe, 11 July 1849”, no.3, *AP*: Session 4 Feb.-8 August 1851, Vol. XL, 1851.

童1元5角，每周供应10磅面粉、10磅新鲜或风干的牛肉，25磅茶叶，1磅白糖”。⁵⁹相比拉美种植园臭名昭著的福利，澳洲牧场主给华工的报酬还是颇显人性的，而且档案显示华工自己也承认雇主态度不坏。如此宽松的社会条件却留不住维多利亚牧场中的华工，从侧面反映了维多利亚荒野自然条件的恶劣以及华人并不总是能很快接受新环境。而在华工对雇主的人身依附程度很低的情况下，他们就能成批逃离契约岗位，还能游荡在城市而不被雇主追讨，最终也是自由职业。最值得关注的是，他们已经对殖民地的舆论造成了影响。鉴于当时整个墨尔本地区人口还不过20000，几十名闲散华工游荡于市中心足以引发关注。以至于澳洲总督向格雷首相汇报时说：“现在我也说不清引进华人来澳洲工作是好还是孬，因为这两个地方（悉尼和墨尔本）的反馈意见太不一样了。”⁶⁰维多利亚殖民地独立是在两年之后，则在1849年至淘金热爆发期间，地方政府的治理和社会生产力不可能发生飞跃，所以尽管档案没有显示这些华工最终的去向，但可以想象无论是他们还是后来的华工，都一直遭受着维多利亚环境的挑战，但也未必没有机会规避。在淘金热爆发之后，这些活动相对自由的华工很容易就近前往矿区碰运气。一个例证是，维多利亚淘金热最早的探金者之一托马斯·邓恩（Thomas Dunn）在1851年7月发现巴拉腊特的“金点”（Gold Point）矿区时，其探险队里就有懂得医术的前华工。⁶¹与托马斯的队伍类似，最初一批探金者是备尝山野环境之苦的，华人们也不例外，可在金子黄灿灿的魅惑下，此时比牧场更恶劣的山地自然环境也不那么难熬了。相比于探究华人是否卷入了第一波淘金潮，他们对自然环境的态度转变更令人感到有趣。这种具有讽刺性的转变反映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就把自然物质转化为社会财富的理想而言，来自所谓文明地区的华人与白人一样贪婪无畏。

主要华人矿工进入矿区之路

尽管厦门契约工可能是最早卷入维多利亚淘金热的华人移民，但是华人矿工群体的主力是来自广东四邑的——他们主要经由香港前来澳洲参加淘金。这些人基本上不是契约工人，所以一度被视为一般自由移民，其实在太平洋贸易网的苦力贸易类型中，这一类被称为“赊欠船票制”（Credit Ticket System）。它是指出洋做工的苦力，无钱购买船票，而由招工代理人垫付，到国外以工资加利抵还，直到还清为止。在债务未清之前，要听从债权人的控制和驱使，不能自由行动。这是一种以表面的债务关系来掩盖人身奴役的制度。它和契约苦力制的区别只是没有定期的明文契约，但还保存了工人与雇主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契约工。⁶²

可是相比于厦门契约工人，在“赊欠船票制”下华人移民澳洲还是带有更多主动性的，因为淘金热已经爆发，前往维多利亚的确是发财的好机会。1852年7月，包令向英国议会

⁵⁹ 陈汉笙，《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四辑），第18页。

⁶⁰ “Governor Sir C.A. Fitz Roy to Earl Grey. 3 October 1849.”

⁶¹ Eric Rolls, *Sojourners: Flowers and the Wide Sea*.p.78.

⁶² 最早在这方面给予充分探讨的是陈泽宪：“十九世纪盛行的契约华工制”，《历史研究》，第1期，1963年。张秋生在《澳大利亚华人华侨史》中有很好的总结，参见原书67页。

报告说：“如果有好消息传来的话，预料会有相当多的自动出洋移民涌向那里。我听说已经有不少体面的中国人自己付出盘费动身去澳大利亚了。”⁶³这里说明了淘金热所吸引的华人移民成分远比传统上想象的复杂。据维多利亚官方材料显示，晚至 1852 年最后四个月，维多利亚主要矿区已经开始出现引人注目的华人矿工群体，而且是有召集人的。⁶⁴此时距淘金热爆发已经一年半，厦门背景的契约工大可不必等到此时才动身淘金，所以这些引发维多利亚当局注意的华工应该就是最早一批的“赊欠船票制”移民。1853 年底，英国驻华领事怀特向英国议会汇报说：“最近已有几个前几年从中国出洋去到澳大利亚的人带着黄金回来了，料想这股出洋移民不久也会像去加利福尼亚的移民一样发展起来。”⁶⁵这绝非臆测，四邑出身的雷亚妹 1852 年到达了维多利亚，前后几次返乡传播消息，到 1854 年，他已带领了 3000 多人前往维多利亚矿区。另一位刘光明则在 1853 年抵达澳洲，随后也回国带许多同乡返回澳洲淘金。⁶⁶以上可以确认大致从 1853 年开始，华人移民日益成为维多利亚淘金热中一股不可忽视的人类主体，这从生态意义上决定了华人的经验将在维多利亚造成相当的影响力。

前往维多利亚的四邑移民规模与厦门契约工们不可同日而语，这恰恰体现了黄金的诱惑力。赊欠船票制移民赴澳很大程度上不再需要由英商招揽而是由中国掮客直接处理，所以从英文档案中很难找到完整的赴澳人数记录，不过仅就可以得到的香港海关及美国外交档案材料看，其数目已经足够惊人。比如 1853 年，从香港去澳洲的华人移民有 10467 人，1854 年 12 月至 1855 年 9 月，又有 10567 人去澳洲。1857 年，从香港去澳洲人数为 17722 人。1861—1872 年，由香港去澳大利亚华工数量逐年减少，总共 10900 人。据保守估计，1851-1875 年，前往澳洲的总人数为 60000 人左右。⁶⁷事实上，影响后人统计此时赴澳人数的最大障碍并不在于华工出洋的经纪人有所变化，而是由于维多利亚官方在 1855 年开始针对华人移民征收歧视性的人头税，其数额高达 10 英镑，这从侧面反映了华人移民矿工流量惊人，已经引起了白人社会的不安。这个政策导致承运商和华人掮客大多安排船只停靠在维多利亚州境外的澳洲殖民地，华人登陆后再迂回辗转进入矿区。如此一来，偷渡就成为华人移民的主要渠道，据谭开令等许多老矿工估测，截止到 1870 年代末，到达澳洲的华人可能累计有 20 万人次。⁶⁸

事实上，1855 年的人头税不仅导致了后来华人移民矿工的数量难以明晰，而且更逼迫他们在前往金矿区途中要蒙受欧洲矿工无需忍耐的环境磨难。1855 年之前，华人可以从墨尔本登陆后前往任意矿区。可在此之后，为了逃避人头税与盘查，绝大多数华工要登陆于南澳大利亚殖民地（South Australia），然后从那里雇佣一个当地人做向导之后徒步辗转前往维

⁶³陈汉笙，《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二辑），第 4 页。

⁶⁴ W. P. Morrell, *The Gold Rushes*, p.220.

⁶⁵ 陈汉笙，《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二辑），第 51 页。

⁶⁶ 梅强伟、张国雄，《五邑华侨华人史》，第 124-125 页。

⁶⁷ 陈汉笙，《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四辑），第 181、241、481、529 页。

⁶⁸陈志明编，《澳洲党务发展实况》，悉尼：中国国民党澳洲总支部，1935 年。第 9 页。谭开令在 20 世纪初留下口述资料时已经 90 多岁，他早年就成为了维多利亚殖民地的华侨领袖，言行具有相当的威信。1888 年，为抗议澳洲殖民地的联合排华行动，华人精英提交了著名的抗议信——“华商雷道洪等为澳大利亚苛税华民事呈总署秉文”，其中就有谭开令积极参与。

多利亞的巴拉腊特金礦，再由巴拉腊特向各區擴散。從南澳到巴拉腊特有兩條路線，一條是從吉尚灣（Guichen Bay）的羅布港（Robe）出發，長達 320 公里，另一條從南澳首府阿德萊德出發，路程遠將近一倍。傳統研究中一般都只注意羅布港路線，因為旅途短，移民更容易接受，據估計在 1855-57 年兩年多里至少有 17000 華人從羅布港來到維多利亞。⁶⁹可是，阿德萊德路線雖然更長，但在秋冬時節却是更合適的選擇，其實也吸引了大批華人。原來這一時節不僅天氣冷而且雨水較多，在羅布港路線上丘陵起伏的地形中，本來就若隱若現的崎嶇道路會變得泥濘不堪，極不利於人馬通行，而阿德萊德路線則是以平原為主。可是在澳大利亞極端稀松的人口密度下，無論哪條路線都會因為缺乏補給點和救助站而危險異常。一個白人移民回憶自己探險的情景說：“當時我遇到了從阿德萊德輾轉來的六七百名中國人。他們有輛馬車裝載著已經病殘了的人，還有補給品。他們排成一隊縱列，每個人挑著一個扁擔和兩個籃子。……我花了半個小時才走過他們的隊列。”⁷⁰維多利亞最大的地方報紙在 1856 年冬季的一份報道中指認：儘管南澳大利亞的路線從 1854 年底之後才出現，可是當時沿途都已經遍布倒斃于路的華工的墳墓。⁷¹ 相比而言，歐洲礦工全都可以墨爾本登陸，在旅館或臨時營地休整後就可以直接北上前往金礦，而且對行人來說，1855 年之後通往金礦的交通與休息設施問題大大緩解，已不再是可能致命的环境不利因素。可對於廣大的華人礦工而言，熬過了艱辛的航海登陸澳洲還不意味著事業的開始。他們緊接著要面臨旅途環境更嚴酷的跋涉，這種白人探險家才走的路線折射出歧視政策對華人礦工最初的戕害。

總體而言，華人卷入維多利亞淘金熱是非常及時的，一開始只是零星的廈門契約工人，緊接著是大批量的廣東四邑移民。但無論是那一批人，如果沒有當時太平洋貿易網促成的遠洋移民條件，都是不可能前往維多利亞殖民地的。不管從海上旅途看，還是從登陸後前往金礦的路線看，殖民主義與種族歧視政策都加劇了華人移民所蒙受的环境磨難。在通往金礦的跋涉路上，華人的遭遇格外曲折，犧牲慘重。儘管華工素來以吃苦耐勞著稱，但是維多利亞的自然環境仍然對他們構成了強大的挑戰：廈門華工在維多利亞殖民地的逃亡事件不僅造成了一定的轰动，也反映了華人移民在缺乏心理和物資準備時並非可以無限忍耐环境困難。只是在對淘金盈利的巨大期望下，他們才能够把克服自然不利的勇氣鼓舞到極致。在進入矿区之後，白人礦工們將更加深刻地領教到這一點。

第四節 對華人移民淘金活動的新分析

對既有結論的質疑

淘金活動無疑是淘金熱時代華人移民與澳洲環境互動的基本內容，有關華人移民淘金的代表性方法與影响早有定論：華人總是淘洗廢旧的礦坑和廢渣（tailings），是所謂的“廢

⁶⁹ Geoffrey Serle, *The Golden Age: A History of the Colony of Victoria, 1851-1861*, p.325.

⁷⁰ Manning Clark, *Select Documents in Australian History (1851-1900)*, Sydney: Angus and Robertson, 1955. p.67

⁷¹ *Argus*, June 16, 1856.

矿翻寻者” (fossicker)。华工总是集体工作，结果让以个体或家庭为单位行动的白人矿工无力与之竞争。最可恨的是，华工浪费并污染宝贵的水源。维多利亚淘金热史研究的权威瑟利就说：“中国人开发废弃的矿，追踪其他人的矿坑，甚至在溪流河床中寻找微小矿藏——这些地方常常被别人忽略。他们很少出现在新矿区。他们最典型的工作形式就是“围场式”(paddock)工作，一两百人一遍又一遍地挖砂淘洗，……他们甚至清扫矿镇尚未修成的街道土路，洗洗也能发现点东西。”⁷²对华人移民矿工最权威的专题研究《来自中国的挖掘者》也说：“华人不考虑这里的气候条件，工作的时候在一个水坑里淘洗矿土，然后把矿土到近边上的坑里，结果污染了两个坑。”⁷³他们的观点都反映了澳洲学界对华人淘金活动的传统共识。华语学术界虽然谴责由此导致的暴力排华行为，但是同样不曾就华人矿工的具体工作方式进行深入分析。至此，华人淘金活动破坏并浪费宝贵的水资源成为毫无争议的结论。实际上，用水纠纷的确是淘金活动中华人与白人移民发生摩擦最主要的原因，为此从口角到斗殴层出不穷。日后白人移民矿工排斥华人移民并进行暴力驱逐的所谓合法理由都在于此，后文另有详述。

这里通过材料的比对，可以发现这些结论的依据源自 1855 年维多利亚议会金矿情况调查委员会的最终报告。这份报告是淘金热中第一篇权威的官方调查报告，历时一年完成，非常详尽地介绍了当时维多利亚主要矿区的开发情况。其中第 164 段说：“中国人满足于通过最粗糙的采矿方式获取最细小的收获。在反复淘洗旧矿坑时，他们用起水来大手大脚，毫不考虑会不会浪费，甚至无视那些保护起来用于引用的水源。结果，由于他们不能或者不愿意理解金矿管理方或者周围矿工的意见，惹出了许多口角。”⁷⁴可是学者们大多未曾留意的是，这份报告还有一份数万字的长篇取证材料记录，其中包含一些最终影响了正式报告结论的证词：1854 年，从美国来巴拉腊特淘金的查尔斯(Charles James Kenworthy)回答了第 1364-1365 号问题。当问及“中国佬(Chinaman)是否很多”时，他回答说：“中国佬破坏了金矿上的所有水源，他们仅仅在表面作业。”接着问他“中国人怎么破坏水源了？”他回答：“他们在里面淘金，他们只淘洗堆在表层的矿土，特别耗水。”第 3038 号问题由卡索曼的酒店老板亨利(Henry Melville)回答，当问他“除了破坏水源外，中国佬还有什么不好？”时，他回答说：“那就是很大的抱怨了，他们从一个水坑取水，然后把尾渣倒进另外一个，于是毁了两个水坑。”最关键的证据是本迪戈金矿委员会常驻委员约瑟夫(Joseph Anderson Panton)在 1855 年做出的，在回答第 4471 号问题时，他说：“他们(华工)一度是后面山谷里令人讨厌的东西。他们破坏水源，欧洲人不会这样，因为他们把所有能掌握的东西都拿来淘洗。他们不挖矿坑，只是单单把矿土拿来淘洗；他们沿着谷地一路走，搜刮一切他们认为有利可图的东西。这样其他人在挖掘的时候，他们就始终在淘洗。”面对这些铁证，既有结论似乎

⁷² Geoffrey Serle, *The Gold Age: A History of the Colony of Victoria, 1851-1861*, p.321

⁷³ Jean Gittins, *The Diggers from China: The Story of the Chinese on the Goldfield*, p.74.

⁷⁴ “Commission Appointed to Enquire into the Conditions of the Gold Fields of Victoria” (March 1855), A.76, *VPLC*, 1854-55. 此份报告于 1978 年重新印制单独发行，本段材料参见：Hugh Anderson, *Commission Appointed to Enquire into the Conditions of the Gold Fields of Victoria*, Melbourne: Red Rooster, 1978. p.103.

无可动摇。但是，同样是取证记录里，还可以发现以下的问答：第 5973 号问题由四邑人阿宽（Howqua）回答，他之前在英国居住了 9 年，平时充当华人的英语翻译。当问到：“中国佬知道不知道那样取水有坏处而且会引起其他矿工的愤怒？”他回答说：“他们知道了啊。在冬天，雨水多，可以用很多水，但是在夏天，一滴水都不浪费啊。”因华人用水问题而接受取证的 4 名人士中，阿宽是唯一的华人，但他也是唯一被正式报告忽略了相关证词的人。

75

从这样的报告及取证记录中，可以认为华人在淘金用水问题上肯定存在欧洲矿工无法接受的浪费行为，但是华人并不是不可沟通、不知改进和不可理喻的，他们已经掌握了当地气候规律。只是这份权威报告一味相信白人的证词，对华人的辩解丝毫没有理睬。这份报告最终导致了 1855 年的华人移民人头税法案，结果维多利亚成为整个英帝国内第一个靠这种手段限制华人入境的殖民地。对于多数学者来说，过分依赖这样一份虽然具有权威但包含种族歧视倾向的报告、也不去仔细查对其背后的完整证词，最终只能对华人的淘金活动得到一种片面的认识。更需要提醒的是，1855 年仅仅是淘金热达到高潮的时代，其后淘金活动还在继续扩大蔓延，许多新的作业方式都在嬗变，仅凭 1855 年的报告就断定华人矿工的工作特点，显然是极其武断的。所以这里连一个基本的问题都有待深究：华人移民矿工究竟是怎样淘金的？他们与环境的互动多大程度上继承了传统经验，多大程度上又发生了变化？

对淘洗废矿现象的深入理解

在对既有论断的质疑中，已经可以看到当年的种族偏见如何影响了官方甚至后世史学家的结论。事实上，要分析华人淘金活动中的这种表现，必须要注意采矿环境以及淘金形式本身的变化。由前四章可知，维多利亚淘金热中的采矿活动曾在形态上发生过重大变化，即从开发冲积金矿（alluvial mining）转向开发石英矿（quartz mining），而冲击金矿开发也有从浅表开发向深井开发的演变过程。在大规模开发冲积金矿的阶段，人们对地质学和矿冶学知识都还只有肤浅的掌握，运气是决定矿工成功的关键因素。无论是浅表土层开发还是用深井对地下古河道的挖掘，资本门槛都不很高。矿工们除非能挖到天然大金块（nugget），否则无论是否具有采矿经验最终都需要用搅拌篮与锡盘来筛洗矿土、搜寻颗粒金（grain）。这种背景下，华人移民虽然之前不具备采矿技能，但吸收其他矿工的经验和技术手段也不难，制度上更是只需缴纳执照费即可，所以华人移民矿工根本没必要只捡遗漏的废渣或废弃矿淘洗。

那么华人为什么不开发新矿呢？这里首先需要留心一个时间上的细节，那就是华工大规模涌入维多利亚殖民地已经是 1852 年底，主要矿区如本迪戈、卡索曼及巴拉腊特名声已经很大，最容易吸引包括华人在内的新来者，但它们都已被开发了一年有余，在核心探掘区域面积有限的情况下，探索到新的富矿坑的边际效益越来越低。这种客观条件就促使华工在

⁷⁵ “Evidence Presented to the Commission on the Chinese, including those of J. A. Panton and the Chinese Howqua”, *IPLC*, 1855. pp72-73, 237, 337.

找不到新矿坑的条件下而宁愿淘洗旧矿坑与废渣。不过，凭借四邑移民在家乡养成的精耕细作的田野劳动模式，反复淘洗前人废弃的矿渣一样可以有利可图，因为矿渣只是含金量低而并非全然没有金子。此外华人移民为何采取一种集体的劳动模式，前人已经给出了比较详尽的论证。主要说来有三个原因：一个是四邑移民是以很亲密的地缘关系集体移民的，到了海外很容易维持既有生活模式。第二个是华人抵达后要面对完全陌生的环境与其他移民群体，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他们往往都依赖几个头领（headman）来对外沟通，不便于单独行动。第三个，集体活动本身能增加华人群体抵御环境与经济不利条件的能力。⁷⁶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对于开发废矿和淘洗废渣来说，这都是必需且有效的工作方式。因为这相当于一种劳动密集性产业，是用加大劳动强度来弥补单位利润率这一不足。在这种劳动方式下，由于只有把溶解于水的废渣细化分解才可能拣出微小的金沙，所以淘洗矿土的行为需要反复进行，而且对劳动力投入规模有更高要求。1855年报告中说白人抱怨华人围场工作、无所不淘洗的根源就在这里。

但当华人矿工的形象因此被定格为“废矿翻寻者”时，问题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因为所谓废矿废渣的产生本身就是白人矿工滥采行为导致的，基本跟华人无关。原来在浅表矿开发时代，白人矿工淘金的首要目标是挖坑找寻天然金块或富矿，而并不愿意安心淘洗工作。所以他们没有持之以恒的精神，都是抱着赌博心态碰运气挖矿，不指望依靠勤奋工作本身发财。前文已述，许多华人移民来澳洲淘金是为了求一条生路，可是淘金热对多数白人移民来说更是纯粹为了一夜翻身。澳洲著名史学家安·科特伊斯（Ann Curthoys）说他们“真不愧是急匆匆的心态”（rush mentality）：“一个小道消息（发现大金块），就可以让矿工们放弃已经挖了100尺深的矿坑，或者让他们停止自己刚刚开始挖的矿坑，然后他们留下成堆的富矿土，那可是只要淘洗就能得到金子的。……相反，中国人把这当成一项生产，而不是买彩票。……他们都是有组织的，集体活动的，不会随便乱跑。”⁷⁷结果走了的白人未必发财，跟进的华人恰到好处。还有许多白人矿工胡乱挖掘一通，只淘洗矿土一遍、找出大颗粒金子就转战其他矿区了，剩下矿土的也成了“废渣”。结果华人移民反复淘洗它们之后，产量仍然很可观。正是由于常常面对废弃的矿坑，华人就更加需要团体合作以提高生产总值，所以他们既有的群体合作生产模式也在维多利亚金矿得到了普遍发扬。据1855年华人矿工自己向议会提交的申诉说：“（我们淘洗）的都是那些之前已经被欧洲人开发过的矿坑，他们放弃了这些地方，因为觉得没啥回报率了，但是我们这样做，让一大笔本来会损失掉的一大笔财富重新抬升进入流通领域了。”⁷⁸至于白人抗议华人矿工倾倒矿渣污染第二个水坑的原因也在双方工作态度与目标不同。正因为欧洲矿工不愿意淘洗低品位的矿土，很少发掘其全部潜力。所以他们可能小心翼翼地保护住水坑，以备将来要重新淘洗用。但华人总是一次性把二

⁷⁶ Ann Curthoys, “Men of All Nations, except Chinamen”—Europeans and Chinese on the Goldfields of New South Wales” in Iain McCalman, Alexander Cook, Andrew Reeves, eds. *Gold: forgotten histories and lost objects of Australia*, p.105.

⁷⁷ Ann Curthoys and Andrew Markus, *Who are our enemies? : Racism and the Australian Working Class*, Neutral Bay: Hale and Iremonger, 1978. p. 40.

⁷⁸ “Petition by Chinese Storekeeper” (December 1856), E.1, *VPLC*, 1856-57, vol.3.

手矿土淘洗彻底，“结果经过华人之手的矿土，才是真正无利可图的矿渣，这样一些东西，华人觉得堆到哪里都无所谓，于是就污染了又一个水坑”。⁷⁹其实，对于矿区环境来说，开发过一次的矿坑就足以彻底破坏地表植被与土壤层了。在这种情况下，当时挖掘出的矿土没有任何人考虑回填，结果华人的工作方式虽然可能多耗费了水，但是没有导致更多的废渣土方产生。更何况在 1850 年代中期，对需要淘洗的矿土进行预加工的搅拌篮（cradle）一天通常只能处理 1-2 立方码（1 码等于 0.914 米）的矿土，远远小于一个矿工一天的采掘量。所以在冬季水源充沛时，华人的高频率淘洗方式其实就克服了矿土产量过剩与预加工不足的矛盾，使得矿土被挖出来后不至于浪费，单位体积的矿土利用率大大提高。⁸⁰总之，即便华人的工作更加耗费水源，但对提高淘金生产率来说，它是有利的行为。而相比于欧洲矿工在急速转换矿坑过程中对土地的大面积破坏，淘洗旧矿也未见得是更不利于环境的工作方式。但是当时的报告和证词却并不反思白人工作方式的后果，只是指责华人对水源的破坏。



图 7-1 华人淘洗的基本装备：搅拌篮、水桶、铁锹⁸¹

要理解华人矿工为什么常常淘洗废旧矿渣，还需要考虑一个社会因素，那就是华人总是得不到或者保不住新开发的矿坑。官方档案干脆完全回避这一问题，但是在当时的报刊资料中它却很清晰地展现出来。早在 1854 年 5 月，维多利亚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墨尔本《阿尔戈斯》（Argus）就报道说，中部矿区法庭第一次受理了华人的起诉，因为他们从一个与白人共同开发的矿坑中被驱逐了出来，最后他们因为无法证明矿坑是自己的而无法保住这个新矿坑。⁸²按学者刘渭平的解释，当时初来乍到的华人，可能因不懂金矿上白人矿工自己约定的

⁷⁹ Ann Curthoys and Andrew Markus, *Who are our enemies? : Racism and the Australian Working Class*, p.38.

⁸⁰ *Ibid.*, p.38.

⁸¹ 本图片藏于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东亚部

⁸² *Argus*, 29 May, 1854.

习惯法而吃亏：“按当地习惯，凡任何一处发现金矿，发现者必须在该处竖立一旗帜以为标志。华工可能不谙此项习俗，未曾照办。欧洲籍工人便据此以攻击华工，责为欺诈。”⁸³这可能是这个案例中华人保不住新矿的重要原因。但是后继发生的一些事情就显得纯属弱肉强食：最初是1855年9月，本迪戈地方报纸报道说“袋鼠沟”（Kangaroo Gully）发生白人用拳脚驱赶华人的冲突，因为水源不足，而华人淘洗旧矿激怒了白人。⁸⁴之后《阿尔戈斯》又报道说本迪戈区域至少发生了两起治安冲突，一次是两位英国矿工在路上殴打了一个华人矿工，就是觉得华人采矿影响他们，及时赶到的警察救下了华人的命。而报道的作者却认为华人该打，因为这个矿区欧洲矿工人数不多，可华人却常常集体采矿，结果抢了白人的彩头。之后半个月，新矿坑“金合欢沟”（Wattle Gully）又发生了少数欧洲矿工联合殴打驱逐华人群体的事件，人数上占优势的中国人用竹竿和石子反抗，但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了。事情起因就是这里发现了新金矿，可白人矿工不想让华人分享，否则他们自己就没机会了，所以要拼命赶走华人。⁸⁵这里展示了淘金热早期的几个案例，说明华人就算能找到新矿也不一定有机会享用，而论打架斗殴华人不如白人有优势。与传统研究的一般结论不同，这里面华人不会放弃反击甚至很早就利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根本不是被动消极的，但都难以取得成功，也得不到舆论理解。不管是为了水源还是富矿，所有矿工都想获得更多的使用份额，而在面对竞争时，白人矿工动辄诉诸暴力驱逐华人，藉此不正当地扩大自身权利。在这种社会条件下，华人矿工由于得不到官方足够的保护，虽有运气探到新矿却无福享用，转向旧矿也就不难理解了。

综上所述，反复淘洗废渣之所以成为华人代表性的淘金方式，不但是金矿资源分布的地理局限所导致，也是白人矿工蛮横抢夺新矿的结果。他们的反复淘洗行为客观上造成了对环境的严重破坏，还导致了水资源的额外消耗。但是对白人社会对这种采矿方法发出的种种责难却是不公正的。其实问题的本质是：由于缺乏对富矿占有和管理的话语权，华人矿工只能去利用废矿。更有失偏颇的是，白人矿工的开采行为对自然的破坏也很严重，但是舆论只追究华人的耗水问题。不过为了求生，华人矿工绝不愿退出淘金活动，他们发扬了在故乡生产环境下养成的工作态度与习惯，最终可以高效提炼含金量较低的矿土乃至废渣，化腐朽为神奇，这与白人矿工形成了鲜明对比。

华人多样化的淘金方式与局限

华人淘洗废矿获利反映出他们在海外秉承着传统经验，但这并不说明他们不接受新经验，也不等于华人移民仅凭吃苦耐劳就可以克服所有环境困难。恰恰相反，他们的采矿活动一方面不断吸收白人的经验和技能，另一方面也在采矿形式的变革下遭遇困境。可以说，在反复淘洗矿渣之外，从形式上到组织上华人都开展了多样化的采矿活动，只是回报不尽相同。

⁸³刘渭平，《大洋洲华人史事丛稿》，p.72.

⁸⁴ *Bendigo Advertiser*, September 5, 1855.

⁸⁵ *Argus*, 17 September, 1855; 28 September, 1855.;

华人矿工并不一定是大规模集体活动的，也不都只开发旧矿。在 1850 年代后期淘金热向维多利亚更边远的内陆蔓延时，他们能够在没有白人干涉的情况下以小组形式发掘新矿。有老华工回忆说：“当时采金之法，极为简单。凡发现泥色有异之处，即掘井取沙。只用一人下井掘沙，一人在井口绞沙，将沙放在木梯盘内，以水冲洗，即淘得沙金。”⁸⁶这里生动表现了华工小规模开发新矿的场景。不仅如此，华人矿工也能够大规模开发新矿区并且收益颇丰，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他们创建了维多利亚东北部的阿拉拉特矿区（Ararat）。1856 年 3 月，数百名中国人开发了这里的“科蒂斯山港”（Port Curtis Hill）矿坑，但当时只有小规模收获。次年 4 月，从南澳大利亚辗转而来的一队华人移民向东北方向进一步推进，发现当地土色有异样，于是在随后被称为“黑色矿脉”（Black Lead）的区域试探性挖掘，结果发现了诱人的古河床沉积金矿。这两拨人之前都已经在其他矿区工作过，所以积攒了许多白人的采矿经验，他们花了 8 个多月挖掘大量浅矿井淘金，还使用了加利福尼亚矿工带进维多利亚的绞盘和轱辘提取矿土，运输速度很快，挖上来的金块多的甚至可以用水桶装。事情保密到 1858 年 2 月，此时矿区多数矿坑被英国移民发现，他们借口华人没有执照而抢占了多数矿坑。据英国矿工自己说，华人开发出的矿坑接近 70 个，每个都价值 1000-1500 英镑。最后华人虽然只能另寻新矿，但“黑色矿脉”以“广州矿脉”（Canton Lead）之名传遍了整个维多利亚，阿拉拉特也成为维多利亚殖民地唯一因华人初步定居而发展起来的城镇。⁸⁷华人矿工吸收白人经验与技术的努力不仅表现在简单的开采环节，也表现在加工提炼活动中。1856 年 7 月，《阿尔戈斯》驻本迪戈固定通信作家威廉·凯利（William Kelly）发表了一篇长文介绍华人移民的采矿活动说：“中国人非常系统地重新淘洗欧洲人开采过的矿坑并且淘洗剩下的矿土，最近他们还利用了很多马拉搅拌机（puddling machine）工作，那都是从欧洲人那里买来的。”⁸⁸马拉搅拌机是 1850 年代中期刚刚流行起来的高效搅拌设备，华人矿工几乎是第一时间就注意利用了它。搅拌机使用的方式很像毛驴拉磨：在一个圆形场地里投入矿土后倾倒入水，然后马匹被固定在套具里绕着中轴转，中轴和马匹之间则连接着木杆，木杆下挂着许多爬犁，转起来的时候就能不停搅拌场地里的矿土，让它们变得细小。然后再把这些碎化的矿土拿去淘洗，冲刷掉泥沙石子就能得到金子。这种工具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而且还相对节约水源——碎化矿土不需要反复冲刷了。修建这样一个装置，大概要 200 磅的投资，要求相对比较复杂的安装与操作，但是华人通过集体投资与分工合作取得了成功。⁸⁹

然而，哪怕华人吃苦耐劳且善于模仿，但他们还是不能适应所有的淘金活动，这一点在深井开采中表现的非常明显。从 1850 年代后期起，浅层的地下古河床冲积金已经开发殆尽，从而需要挖更深的井才能获利，采矿成本以及对技术的要求都大幅提高。对此，在欧洲移民中，具有丰富深井开发经验的英国康涅什矿工优势非常明显，可华人因为缺乏资本和矿道修建技巧只能望井兴叹。偶尔有华人集体买下旧矿，但旧矿井中支架本身已经老化或缺损，华

⁸⁶ 陈志明编，《澳洲党务发展实况》，第 10 页。

⁸⁷ Eric Rolls, *Sojourners: Flowers and the Wide Sea*, pp.144-145.

⁸⁸ *Argus*, July 17, 1856.

⁸⁹ Valerie Lovejoy, “Depending Upon Diligence: Chinese at Work in Bendigo (1861-1881)”, p.29.

人无力重建矿道支架，结果常常遭遇塌方事故。维多利亚中部山地土质稀松，由于浅表土层有高密度挖矿，地表植被已经损失殆尽，偶有大雨就会导致水土变成粘稠的泥浆，一块土坠落往往连带一大片坍塌。不仅如此，地下矿道由于没有木板铺砌，同样泥泞至极，这不仅让挖矿变得困难，而且即便地面上有人报警，地下的却连逃跑都来不及。所以矿难是困扰所有矿工的问题，但摧折华人尤甚。1850年代后期以降，本迪戈逐渐成为深井矿开采的中心之一，但其中极少有华人的深井。在1854-1865年老矿区本迪戈死亡的华人中，70%以上都是采矿人员，总计31个死亡记录中，26个都是被塌方活埋的。根据维多利亚中部新兴沃恩泉（Vaughan Springs）矿区的记录，在1857-1859年意外死亡的66人中，有38个都是华人，其中11个就死于矿难塌方，另外6个死于呼吸系统疾病。⁹⁰由于这些死亡统计是地方验尸官做出的，难以获得整个维多利亚的情况，而且这里有关华人的部分非常不完整，但足以让人想象深井矿难对华人的威胁之大。从一份总结1850-60年代情况的中文记录来看，虽然不够具体，但对整个维多利亚州的情况有较多所反映：“其矿井有深至十余丈者，井边不固，每一崩坏、则葬身其中。吾侨为开矿而死者，不可胜计。为了告慰死者，乃发起义祠，当时报名入祠者，在7000人以上，一二年内增至万名，今日仍存于墨尔本四邑会馆中。”⁹¹这里的死亡矿工未必都是因为深井开采，但是这种开采方式的死亡率显然对华人群体产生了极大的刺激。这也就证明在缺乏真正的矿井开发技术及足够资本的情况下，华人移民仅靠毅力、耐心与勇气并不足以克服矿区复杂的地下环境。所以华人移民可以在浅表发掘甚至矿渣淘洗中成功，但是在深井开发中却不像前者那样硕果累累。这也导致在1861年至1881年中，白人矿工几乎都转入了更依赖深井技术的石英矿开发，可许多华人还是只能延续冲积金矿开采——主要是淘洗废矿渣。相比与1850年代冲积金矿开发的全盛时期，此时这类矿工中白人人数减少了80%，华人则比之前只减少了40%。⁹²这一点在议会委派的华人调查委员会报告中得到了证实：委员会主席威廉·杨（Rev. William Young）详细记录了1867年维多利亚所有主要矿区的华人职业分布，发现在巴拉腊特、卡索曼及本迪戈等大矿区，华人移民仍然是浅表金矿淘金的主力。⁹³事实说明，在维多利亚矿区特定的地理地质条件下，灵活通变的华人移民也被无情地制约了其成功的空间。

华人水利技术在矿区的应用

华人善于发挥传统经验的优势，也能吸收新技术和新经验，那么他们的淘金技术是否也对周围矿工产生影响呢？之前的研究对此是语焉不详的，但事实上华人淘金技术不仅有效仿学习白人经验的部分，也有输出并被对方认可的部分。这里最引人注目的是华人利用传统的水利技术大显身手。

⁹⁰ Keir Reeves and Benjamin Mountford, “Court records and cultural landscapes: Rethinking the Chinese gold seekers in central Victoria”, p.7.

⁹¹ 陈志明编，《澳洲党务发展实况》，第10页。

⁹² Valerie Lovejoy, “Depending Upon Diligence: Chinese at Work in Bendigo (1861-1881)”, p.28.

⁹³ W. Young, “Report on the Condition of The Chinese Population in Victoria” (August 1968), no.56, *VPLC*, 1868.

从前文得知，在故乡的农业生产体系中，修筑水坝水渠以蓄引水流是四邑人的拿手好戏，而维多利亚矿区整体上看属于缺水地区，一方面不利于水利大开发，但另一方面又格外要求治水经验。据 1852 年的一份材料介绍说：“维多利亚的溪流和澳洲其他的河流大体一样，一点也不像欧洲或者美洲的河流那样美好，在数量上就少得可怜。水流上看，除了休姆河（Hume），或上墨累河（Murray）以及亚拉河（Yarra）的一部分，都是微不足道的，完全不适于内河航运。事实上，它们面临的水源补给也极不规律，也就是说，在雨季经常泛滥成灾，波涛汹涌，溢出河床，淹没村落，裹走一切；夏日里，它们又断流，有些河床更是变得干燥如土路，另外一些只剩下一点点水，可能是得自地下深泉的补给，或者是来自难以辨别的天然井，河床上就反反复复交替发生这些情况。”⁹⁴就矿区而言，本迪戈与巴拉腊特等地都缺乏像样的地表径流，仅有靠东北的地方如比奇沃斯（Beechworth）、欧文斯（Ovens）由于有墨累河的主要支流过境而水源相对充足。此外，采矿用水不仅受到天然水源短缺本身的影响，还要受到降雨季节分布不平衡的影响。面对这些难题，白人矿工哪怕是康涅什矿工的应对方法都是先把矿土挖出来堆积，等到雨季了再淘洗，或者是用手推车把矿土推到河边，专门留人在那里淘洗。⁹⁵即便如此，水源也是越来越不足的，生产屡屡受挫。原来一方面矿工挖掘出来的矿土和废渣往往肆意堆积与倾倒，结果淤堵填埋溪流河水，另一方面许多溪流因为河床本身也被反复挖掘导致淤塞而最终枯竭。⁹⁶面对这种情况，矿工们自然考虑要修筑堤坝蓄水或者挖井，但一直无法扭转大局，以至于本迪戈等地出现了夏季（旱季）停工，冬季（雨季）开工的现象。

不过许多华人矿工做到了在尽可能不迁徙地情况下克服了淘洗缺水的问题——他们的引水技术大显神通。至少在 1860 年代时，在地表径流比较充裕的地区，华人移民习惯性地建造起了木质百叶水车引水，周围人则觉得这不啻为一项聪明绝顶的发明。⁹⁷水车修成，华人再在水车提水口挖掘渠道，渠道很深但是口并不宽。许多华人矿工已经是沿着水渠淘洗金矿，或者说挖到哪里，就把水渠修到哪里。他们堆积起的废渣总是整整齐齐垂直排开，实际上又形成了比较牢固和加高了的渠岸。⁹⁸水渠延续得很长之后，维护又是一个问题。这里必须说明的是，华人集体工作的优势再次表现了出来，因为开挖水渠需要密集的劳动力投入，而在雨季修补水渠以及排除内涝方面，就更需要高效的华人集体行动。这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为什么白人矿工经常是知道去挖掘水渠，但也无法真正维持。事实上，这些方法已经得到了白人矿工的注意。现在虽然无法找到直接证据显示华人矿工在修建水渠一事上与白人矿工有通力合作，但是一个旁证可以有力地证明这一点。新南威尔士兰坪滩（Lambing Flat）矿区地理条件与维多利亚东北部金矿几乎完全一样，这里的华人矿工多数也是从维多利亚东北

⁹⁴ F. Lancelott, *Australia As It Is: Its Settlements, Farms, and Gold Fields* (Vol.2), London: Colburn and Co., Publishers, 1852.p.55.

⁹⁵ Eric Rolls, *Sojourners: Flowers and the Wide Sea*, p.125.

⁹⁶ Neil F. Barr and John Cary, *Greening a Brown Land: the Australian Search for Sustainable Land Use*, Hong Kong: Macmillan Education Australia, 1994. p.54.

⁹⁷ Jean Gittins, *The Diggers from China: The Story of the Chinese on the Goldfield*, pp.75-76.

⁹⁸ Barry McGowan, “The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of Chinese Mining in Colonial Australia”, p.126.

部转移而来的。他们在 1860 年代与德国工程师合作，将传统的在河流中筑坝的技术应用到矿区河流中，成功地改变了河流的流向，解决了矿区的缺水问题。⁹⁹此外，华人特别成功地应用了导流技术开展流槽洗矿（sluicing）。这种技术起源于加利福尼亚，原理就是修建长长的木水槽，从水源充足处开始向地势低的地方延伸，把矿土加入木槽内后，不断加水冲刷，越轻的物质流得越远，从而拣出金子（参见图 7-1）。但在干旱的维多利亚，华人矿工把引水渠疏导技巧与之结合后才使它具有了应用价值。华人至少在 1860 年代已经使用这种方法。根据一些详细的文字材料显示，从 1878 年开始，维多利亚中部白山矿区（White Hill）陆续有 23 个华人组织注册开展这种洗矿方式，首先都是修建长长的引水渠，将水流从总蓄水处引导出来。进入多雨季的 12 月份，华人组织的采矿群体一天三班倒，不间断用水流冲洗矿土。¹⁰⁰1879 年 1 月，两个白人矿工与四个华人矿工组合成立了公司，雇佣了 40 个华人与白人矿工一起开展流槽洗矿。“这说明欧洲人也承认华人矿工管理水的才华，接受了他们从家乡带到金矿来的农业用水技巧。”¹⁰¹显然，在 1860 到 1870 年代中，随着淘金热采矿形态的复杂多样化，华人矿工与白人矿工的技术交流也不断深化，华人的水利治理方面的能力令白人移民也无法抗拒。



图：7-2 华人的洗矿槽¹⁰²

⁹⁹ 许多华人矿工在维多利亚东北部开发金矿之后，会顺墨累河或其支流走向顺势进入新南威尔士境内。这个矿区后来改名叫做杨市（Young）。旁证材料参见：<http://www.chinatown.com.au/henry/newarticle.asp?id=641>

¹⁰⁰ *Bendigo Advertiser*, 24 December, 1878.

¹⁰¹ Valerie Lovejoy, “Depending Upon Diligence: Chinese at Work in Bendigo (1861-1881)”, p.29.

¹⁰² Frederick Grosse, “Chinese Gold Miners Sluicing, near Beechworth”, 1867.
<http://nla.gov.au/nla.pic-an10328049>



图：7-3 华人立体引水技巧素描图



图：7-4 华人立体引水技巧之应用¹⁰³

¹⁰³原图藏于比奇沃斯中国文化中心（Chinese Cultural Center），一幅是 1860 年代的素描作品，另一幅则是 1870 年代的摄影作品。作者翻拍于由澳大利亚国立图书馆东亚资料部提供的图片，特此致谢。

事实上，在水源不足特别是缺乏流动水源的情况下，华人矿工依旧可以应付淘金所需水源。如图 7-3，这幅图显示了华人高超的立体引水技巧，最早记录这种方式的淘金地点是华人较多的维多利亚东北部比奇沃斯矿区。在 1850 年代淘金热高潮期，冲积金矿富矿很多、回报率高。矿工运输矿土去远处淘洗也是有利可图的，所有这种技术并不必要，但进入 1860 年代后，浅层冲积金矿的开发日益萎缩，废旧矿的二次开发力度加大，则这种利用较少水源就地淘洗的技术就颇有价值了。由于老矿坑周边土层的厚度不同，采掘面也有不同层次，可在仅是最底层有积水的情况下，想保证每一层都有获得淘洗用的水源似乎是难以实现的。如果像白人矿工那样运矿土去河边淘洗，那生产效率大大降低不说，运输成本也过高。但是在这两幅图里，可以发现最底下的一名矿工在继续挖水坑，另一名则就近开始淘洗工作。而最顶层的两名华人矿工使用竹竿作为轨道，斜着架在矿坑壁上，然后在上面绑上水桶把底层水坑中的水舀到需要淘洗矿土的作业面上，满足另外两名矿工的工作需要。这不仅解决了提水问题，而且非常省力。从图 7-4 中还可以发现，这些矿坑的作业面积非常巨大，但是却不需要大量水源。这种疏导管大大降低了对矿土运输的要求，获得淘洗旧矿人群的普遍欢迎。尽管从图 7-4 中看不出引水用的竿子是否竹制，但图 7-3 中的竹节则明确昭示出这是一种地道的中国经验。竹子作为建筑和生产材料广泛应用于中国南方地区，但是白人矿工却从不使用。维多利亚没有丰富的竹林，这些竹子多是华人矿工从中国带入的，本来是挑货用的扁担筒。¹⁰⁴“这些竹竿直径大概有 2 英尺，6-8 英尺长，非常坚韧，能挑很沉的行李”。¹⁰⁵它们也可以很容易地串联起来投入引水设备的建设。事实上无论建筑材料如何，图 7-4 中显示画面中心戴斗笠的华人矿工与近处大胡子的白人矿工已经混合在一处，都使用这种方法提水了。

显然，有充分的材料说明，华人在故土积累培养出的农田水利技术在维多利亚金矿大有发挥空间。为了最大限度地攫取金子，无论是在水源充足的情况下还是在不足的情况下，无论是淘洗新矿富矿还是淘洗旧矿废矿，华人都能够因势利导地采用自己的传统技术和材料将开采活动顺利推进下去。华人矿工的技术在一定程度上也被白人矿工所承认与采纳，这也否定了华人移民与白人无法沟通、华人移民总是社会冲突牺牲品的简单结论。

第五节 对华人农业生产的全面理解

华人蔬菜种植业缘起再分析

与白人移民一样，淘金热中华人移民与维多利亚环境的互动也从不局限在矿产开发之上。杰弗里·布莱尼认为当时华人群体与白人群体在生活上是不影响的，但他在晚年对这一观点做了修正：“华人的生活方式对说英语的矿工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但有两个例外，一个是蔬菜种植业，另一个是针灸。”¹⁰⁶不过，就目前可以获得的中、英文资料看，无论是当时的记录或是后人的研究都极少涉及维多利亚淘金热时代中医药的发展，这暗示着在十九世

¹⁰⁴ *Argus*, April 16, 1856; June 19, 1856.

¹⁰⁵ Nancy Keesing ed, *Gold Fever: the Australian Goldfields 1851 to the 1890s*, Sydney: Angus and Robertson, 1967, p.122.

¹⁰⁶ Geoffrey Blainey, *A Land Half Won*, South Melbourne: Pan Macmillan Australia Pty Limited, 1995. p.165.

纪中后期包括针灸在内的中医药活动对白人社会的影响不会很大。¹⁰⁷而蔬菜种植业就大不相同了，当时民间媒体材料中的记录非常密集。现实中，蔬菜种植业直到 20 世纪初仍然是华人移民的优势职业之一，当时整个澳大利亚东部沿海中心地区都已依赖华人的蔬菜供给。在白澳政策已经盛行的 1911 年，还有作家克洛斯（E·Clowes）念念不忘说：“正是因为华人菜农提供新鲜的蔬菜，才防止了澳大利亚沿海定居点出现败血症，而且由于他们的辛勤耕作，荒地变成了生产区。”维多利亚金矿区正是华人移民蔬菜种植业的关键起点之一。

切不可忘记的是，维多利亚主要矿区在淘金热爆发前都是人烟稀少的贫瘠山地，农耕活动几乎是空白的。短短几年内，成千上万不从事农业生产的矿工涌入这块狭小的空间，其饮食起居立刻就构成一个现实的生态压力，从而也激起了发展农副业的要求。由前述章节可知，在交通运输条件非常恶劣的 1850 年代初期，白人矿工的主要食物是羊肉和面饼，他们的菜单里几乎是没有新鲜蔬菜的，这立刻导致了由维生素及粗纤维缺乏所引起的各种疾病。1852 年下半年起，越来越多的矿工要求占用矿坑附近的土地搞农副业，这样就可以吃到水果、蔬菜和鸡蛋。¹⁰⁸可此时非矿业用地的分配问题还没有列入官方矿区管理的核心议程，矿工们无权合法开发矿区的土地，蔬菜种植业很难发展。另外一个更现实的阻碍因素在于，1850 年代浅层冲积金矿的开发处于兴盛状态，多数欧洲矿工要频繁穿梭于不同的矿区挖掘新矿坑，难以定居。可蔬菜生长却要求一定的周期，于是相对于看似回报快、利润率高的淘金活动，种植蔬菜成为白人矿工不愿投入的行当。这种想吃菜、没有菜又懒得种菜的吊诡局面成为维多利亚淘金热初期白人矿工与大自然之间的一组重要矛盾。

不过从 1850 年代中期起，华人矿工打破了这种局面，其原因是多样的。多数传统的观点强调华人发展种植蔬菜业跟他们自己的食谱有关，比如克罗宁就觉得华人的食品以蔬菜和主食为主，不像白人矿工那样深深依赖肉食，他们也买不起肉。¹⁰⁹这判断大体不错，一般来说华人对蔬菜的需求程度是远远高于白人的，这完全可能是他们种菜意愿的刺激源。但是当时的华人移民习惯于自给自足，填饱肚子的方式也很多，未必亟需种植蔬菜。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华人随身行李总是装上可以维持相当长时日所需的食品和生活用具。在主食供应方面，一开始华人是自己携带大米踏上移民之路，后来也利用以墨尔本为中心的大米销售渠道。¹¹⁰尽管如今很难厘清华人一开始究竟吃些什么辅食，但是旁观者的一条有趣记录透露出部分信息：“在南澳登陆而来的中国人带着鸭子，他们居然提着鸭子。切好的、腌制好的鸭子，储存在装满油的罐子里。他们还带着自己酿的酒，那种足以让人醉倒而不是提神的酒。”¹¹¹另一方面，官方记录则暗示着华人矿工居民区很快就普遍饲养猪和羊了，因为 1857 年 6 月维

¹⁰⁷有关 1900 年后中医药在澳洲传播的论文，参见 Ray Tiquia, “‘Bottling’ an Australian Medical Traditi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uring the Australian Federation”, in John Fitzgerald, Sophie Couchman and Paul Macgregor ed, *After the rush: Regulation, Participation and Chinese Communities in Australia, 1860-1940*, Kingsbury: Otherland Literary Journal, 2004, pp.192-203.

¹⁰⁸Geoffrey Serle, *The Gold Age: A History of the Colony of Victoria, 1851-1861*, p.84, 133.

¹⁰⁹ Kathryn Cronin, *Colonial Casualties: Chinese in Early Victoria*, p.6.

¹¹⁰ Eric Rolls, *Sojourners: Flowers and the Wide Sea*, pp.108-109.

¹¹¹ Thomas Drury Smeaton, “The Great Chinese Invasion”(1865), in Nancy Keesing ed., *Gold Fever: the Australian Goldfields 1851 to the 1890s*,

多利亞議會要專門對華人居民區下一道命令，說必須“各家好好看管豬和羊”。¹¹²這些證據說明當地華人填飽肚子不一定困難，而且也不是只愛吃菜。此外，連豬和羊都能養殖的情況說明除了華南人的食譜問題，華人自給自足的传统小農生活習慣也得到了保留，而這也可能是華人要開展蔬菜種植的原因之一。

但無論如何，學者們將蔬菜種植業的發展與淘金活動割裂看待是不合適的，華人的飲食習慣或種養傳統只是一種主觀條件，它最多能解釋華人願意種菜，卻無法解釋蔬菜種植為何成為一種產業。事實上，華人淘金活動的特殊處境最終創造了華人蔬菜種植業的興起條件。如上一節所說，華人移民普遍具有耐心細緻的工作風格，他們不會隨便轉換礦坑，而是很仔細地圍繞一個礦坑工作，尤其是在開發廢舊礦坑時，更是慢工出細活。所以華工可能在一個地點駐留較長的時間，從而使得蔬菜生長周期的問題得到克服。更重要的是，廢舊金礦往往是管理當局不太關注的區域，利用廢舊土地種菜不容易引起白人和當局的刁難。當蔬菜種植業初步發展起來之後，有一個歐洲裔農學家就評論說：“華人種植業是通過把白人礦工不屑占用的土地哄騙過來才得以發展的。”¹¹³這種情況在1860年代後由於華人無法大量參與深井開採活動而進一步加劇——越來越多的華人無法再只依賴淘金過活，所以只能選擇種菜掙錢。¹¹⁴所以說，華人蔬菜種植業的出現固然與移民的傳統生活習慣息息相關，而最直接的原因還在於他們在採礦業中的處境，這是華人移民在淘金熱中夾縫求生的副產品。

華人蔬菜種植業的擴展、特點與影響

1854年維多利亞金礦情況調查委員會報告的舉證材料中有如下一段對話——華人阿寬被提問“中國佬能種麥子和蔬菜么？”他立刻回答“是的，所有中國佬都喜欢務農。”¹¹⁵阿寬或許誇大了華人移民的農業情結，但是這裡的問答已經反映出官方很早就注意到華人在種植業上的特長。需要注意的是，華人蔬菜種植活動在維多利亞各個礦區出現的時間並不相同，有時差別還很大，但一開始的確是礦工為了自給自足兼職進行的。這進一步反映出蔬菜種植業並不是華人首選的謀生手段。比如唯一給後人留下口述資料的礦工阿星（John Ah Siug）主要在維多利亞中部礦區活動，他是這裡最早的華人菜農之一：1866年他利用新公佈的《選地法》修正案第42款建設起32平方英里的大菜園，種植的是西瓜和各種蔬菜，還養了雞，但都是為了自己和同伴吃，其主業仍然是淘金。¹¹⁶而在維多利亞東北部水源更足的比奇沃斯礦區，一位歐洲礦工的妻子則回憶說從1850年代末起，“種植蔬菜的華人已經非常多，礦上幾乎所有人需要的蔬菜都由中國人提供”。¹¹⁷顯然，比奇沃斯的商業蔬菜種植活動起步更早。

¹¹² “Regulation for the Chinese on the Gold Fields” (14th July, 1857), A.69, *VPLC*, 1856-7.

¹¹³ Kathryn Cronin, *Colonial Casualties: Chinese in Early Victoria*, p.65.

¹¹⁴ Warwick Frost, “Migrants and Technological Transfer: Chinese Farming in Australia:1850-1920”, *Austral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42.no.2, (July, 2002), pp.116-117.

¹¹⁵ “Evidence Presented to the Commission on the Chinese, including those of J. A. Panton and the Chinese Howqua”, p.336.

¹¹⁶ 第42款允許礦工在任何礦坑附近開發皇家領地，每年交年費即可。參見：Jong Ah Siug, translated by Ruth Moore and John Tully, *A Difficult Case: An 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Miner on the Central Victorian Goldfields*, Daylesford: Jim Crow Press, 2000.

¹¹⁷ Edward Duyker ed., *A Woman on the Goldfields: Recollections of Emily Skinner, 1854-1878*, Carlton:

无论如何，到 1870 年代，矿区中华人蔬菜种植者已经大量种售生菜、卷心菜、马铃薯以及萝卜。¹¹⁸这里至少前三种蔬菜并非四邑人的大宗菜品，显然华人的蔬菜种植业已经主要面向了广阔的白人市场，而此时的矿工人口较多的本迪戈和比奇沃斯也成为华人菜农最密集的地区。

毋庸置疑，华人蔬菜种植业的崛起大大解决了所有矿工都缺少新鲜蔬菜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还改变了矿区景观并且促成了一些中国式农耕经验的推广。在选地法之后，华人菜农能够相对轻松地利用靠近水源的肥沃土壤扩大蔬菜生产能力。他们将地表除草平整后就种植蔬菜。比如 1870 年代成为矿工蔬菜基地的罗登河（Loddon）农业区就是被华人开发出来的，这里靠近亚历山大山（Alexander Mount）矿区，冲积土肥厚。“在这里，华人用爬犁将土壤翻松，然后在土地中齐刷刷地垒出菜畦，再沿着划好的菜田格子挖浅浅的方形水井，最后进行浇灌。”¹¹⁹以此为例，维多利亚中部矿区许多城镇附近相对肥沃的土地都发展起了种植业。相比于这种常规土地上的种植业，更令人惊叹的是华人在恶劣地形与地质条件下发展的蔬菜种植业，而这是更常见的情况。在此最典型的例子是 1860 年代后维多利亚最大的矿区本迪戈。由于历史上大面积的浅层采矿行为，矿区一带已经很难找到像样的可耕地，可是华人以每 0.125 英亩 1 英镑年租金从官方手中获得耕种许可证，然后若干华人把几块土地合并成大小适中的菜地一起进行蔬菜种植。当地媒体报道说，在密集的矿坑中，华人愿意花大量的时间清理掉板结的粘土块以及数不清的石英石废渣，然后反复松土并平整土地。¹²⁰不仅如此，华人矿工还要施底肥——他们引入了四邑的绿肥技术。绿肥就是把废弃的新鲜植物揉碎埋入土里当做基肥。在种植工作开始后，他们又始终注意施加有机肥追肥，就是把积攒的人畜排泄物和有机垃圾埋入土壤。华人菜农会专门走访营地收集这些肥料，而四邑矿工社区的头领也要求麾下矿工把生活垃圾与粪便堆积到指定区域，否则罚款。¹²¹这个经验得到了非常普遍的应用，也成为华人蔬菜特别优质的关键原因。考古学的材料证明在罗登河农业区，华人定居区从来没有蓄粪池和有机垃圾的堆积，这与白人定居区很不同。这说明华人把这些有机物都用于肥料了。¹²²在种植业方面华人的农田水利技术也得到了推广。1863 年本迪戈遭遇旱灾，民众在向政府求助的申诉中说华人矿工利用了引水渠技术，避免了旱灾对蔬菜业的毁灭性打击。而且在极端缺水的情况下，华人矿工还可以完全靠人力肩挑手抬取水浇灌菜园，为了避免被炽烈的阳光暴晒，华人通常是每天天亮前就开始浇灌菜地，异常勤劳。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十九世纪末期自来水应用为止。当地媒体评论说：“华人用极大的耐心应用了他们从本国乡村获得的知识，简直让欧洲人无比羡慕和嫉妒！”当地舆论承认：“如果没有华人，人们要多付 50% 的钱才能买到生菜、洋葱和水萝卜。”¹²³ 华人菜农在本迪戈受到了极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56

¹¹⁸ Warwick Frost, “Migrants and Technological Transfer: Chinese Farming in Australia: 1850-1920”, p.124; Zvonkica Stanin, “From Li Chun to Yong Kit: A Market Garden on the Loddon: 1851-1912”, p.21.

¹¹⁹ Zvonkica Stanin, “From Li Chun to Yong Kit: A Market Garden on the Loddon: 1851-1912”, p.30.

¹²⁰ *Bendigo Advertiser*, 22 July 1862.

¹²¹ Kathryn Cronin, *Colonial Casualties: Chinese in Early Victoria*, p.92.

¹²² Zvonkica Stanin, “From Li Chun to Yong Kit: A Market Garden on the Loddon: 1851-1912”, p.30.

¹²³ *Bendigo Advertiser*, 3 December 1863; 30 January 1863.;

大欢迎。1865年本迪戈举办了农产品推广会，专门印发了中文宣传材料，还让华人菜农自己做广告。¹²⁴显然，通过蔬菜种植业，华人移民与白人的交流大大加深，蔬菜交易市场成为双方沟通与合作的舞台。

大体说来，在冲积金开采日益衰落的1860-70年代是华人蔬菜种植业飞速崛起的阶段。根据1867年威廉·杨牧师报告的统计数字计算，华人菜农在男性华人总就业人口中所占比例是4.6%，而参看1871年维多利亚统计局的资料，同类华人比例已经上升到8%，到1881年，菜农比例上升到19%。¹²⁵正在这种发展态势下，矿区的种植业促成了一个意外的积极效果——许多被采矿破坏的地表景观与土壤又变得富有生机。由于蔬菜种植活动的大发展，一些新物种也被带进了当地生态体系。比如最近的考古学成果就确认了维多利亚华人定居点遗迹附近有香葱（spring onion）的生长，但早已经野化，这是本土植物体系中根本没有的。由于白人喜欢吃的是欧洲大葱（leek），所以香葱必定是华人引种的。¹²⁶所以说，因为采矿活动而促成的蔬菜种植业是华人与维多利亚环境互动的重要内容。种植业的成功，既是华人转行谋生所需，更是他们在发挥传统经验的同时改造当地自然环境、满足社会需求的结果。



图：7-5 中国人新开辟的蔬菜种植园，从中可见它导致的林木砍伐问题¹²⁷

¹²⁴ *Bendigo Advertiser*, 18 September 1865.

¹²⁵ 参见：W. Young, “Report on the Condition of The Chinese Population in Victoria”, (August 1968).; G Oddie, “The Lower Class Chinese and the Merchant Elite in Victoria: 1870-1890”, *Australia Historical Studies*, vol.10, no.37,(1961),pp.66-67.

¹²⁶ Keir Reeves and Benjamin Mountford, “Court records and cultural landscapes: Rethinking the Chinese gold seekers in central Victoria”, p.5.

¹²⁷ 参见维多利亚金斯顿（Kingston）地方史学会：<http://localhistory.kingston.vic.gov.au/html/article/322.htm>

华人多样化的农业生产活动

华人蔬菜业的大成功影响非常深远，到十九世纪末，许多澳大利亚农学家甚至思考如何吸收华人种植业中的密集型种植与劳动力投入模式，“就生产工具而言，华人对欧洲移民影响不大，但是在工作态度和组织模式上，华人产生了影响。”¹²⁸正是由于华人这方面的素质，他们也胜任维多利亚淘金热所引发的多样化农业生产活动。既往研究多数只涉及华人蔬菜种植业的问题，其实华人能够以多样化的农业生产活动参与维多利亚自然环境的重塑。

从大背景来说，大量涌入的矿工对农产品的需求是非常多样且急切的，这导致了农业开发行为在维多利亚矿区的全面开花。淘金热推进到 1854 年时，维多利亚农耕地的面积已经恢复到 1851 年的水平，数量达到 55000 英亩，然后平均每年增加 60000 英亩，到 1860 年时增加到 419000 英亩。¹²⁹这样一来，农业对劳动力需求也不断加强。根据官方档案看，绝大多数华人以季节性劳工的方式卷入了农业生产。1860 年代这种农业劳工的数量持续攀升同样与华人越来越难以单凭淘金维持生计有关。以 1867 年为例，参加了秋季收获的兼职华人矿工人数比参与种植蔬菜的还多，总计达到了 980 人以上——当时的菜农不过 813 人。¹³⁰秋收和剪羊毛一样要求在短时间内进行高强度的劳动，华人显然是非常合适的。除了收割本身的高强度劳动，清理地面的活动也往往有华人承担。与澳大利亚东南部多数地区一样，维多利亚矿区周边农业区的田地要通过开荒和毁林才能平整出来。而对华人来说，没有什么地方会因为太贫瘠或者条件太干旱而不能进入。¹³¹树皮环剥和伐木是非常耗时且费力的活动，在荒野里重复这种劳动也是枯燥单调的，但是华人仍然可以做的很好，最终这也形成一项职业。1870 年代早期，约翰·福特（John Ford）在维多利亚北部墨累河边的瓦袞雅（Wahgunyah）农耕区设立面粉磨坊，所需木材燃料全部由 40 个华人伐木队承担，每工作一次至少要消耗一批 11 捆(cords)的木材。而这里仅 1873 年全年的供货量就是每 14 天送 24 批。¹³²这种工作量是一般白人工人难以想象的。到 1880 年代之后，树皮环剥法正式合法化，于是“许多澳大利亚华人把他们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于开发澳大利亚的处女地，……而伐木和剥树皮的工作常常由华工承担。”¹³³显然，华人的出现大大加剧了维多利亚矿区的毁林开荒现象。但他们也再次证明了自己在这块边疆地区谋生的优势，强体力劳动也成普遍成为中下层华人移民转行的最初方向。

但是如果认为华人在维多利亚矿区仅仅能承担耗费体力的农活就又是一种浅见，他们完全能够承担非常精妙的农业种植活动，这是在故乡世代熏陶的结果。在淘金热中后期，农业活动越来越频繁是日益司空见惯的现象，但是除了小麦、玉米、燕麦等粮食与饲料作物，

¹²⁸ Warwick Frost, *Migrants and Technological Transfer: Chinese Farming in Australia: 1850-1920*. p.129.

¹²⁹ Geoffrey Serle, *The Golden Age: A History of the Colony of Victoria, 1851-1861*, p.231.

¹³⁰ 根据以下材料中的数据合算：W. Young “Report on the Condition of the Chinese Population in Victoria”, (August 1968).

¹³¹ Douglas Montague Gane, *New South Wales and Victoria in 1885*, London: S. Low, Marston, Searle & Rivington, 1886.p.58.

¹³² 一捆相当于 3.12 立方米木材。Cora Trevarthen, “After the Gold is gone: Chinese Communities in Northeast Victoria, 1861-1914”, *Journal of Chinese Australia*, Issue 2, (October 2006).p.7.

¹³³ 杨进发著，《新金山：澳大利亚华人（1901-1921）》，第 55 页。

经济作物大开发也成为一项重要的农业活动。维多利亚殖民地和澳洲多数殖民地一样，对北半球来的移民而言就是一块处女地，这里究竟可以种些什么呢？于是它变成了培育外来农作物的试验场。在蔬果种植方面，一个首当其冲的项目就是西红柿生产的起步——维多利亚完全是依赖华人才建立了闻名澳洲的西红柿产业。不仅鲜西红柿是白人厨房里不可缺少的传统蔬果，西红柿酱更是他们每天都可能需要的基本调味料。而在十九世纪下半期，华人在维多利亚种植的西红柿已经完全满足了百万人市场的需求。¹³⁴此外还有啤酒花、烟草种植业的萌芽也都跟华人相关，而这些作物更不是仅凭体力和耐心就可以侍弄好的。一个例子是老矿工潘阿兴（Pan Ah Shin）父子。1879年，他们从巴克兰河谷矿区（Buckland Valley）向西北方向迁徙到了国王河谷（King Valley）的埃迪（Edi），随后建立了自己的小农场。这一带在当时由于没有重要金矿发现，仍然是人烟罕至的区域。落户后，他们披荆斩棘，头一年就种植燕麦、烟草和啤酒花，接下来的5年里又种植起了马铃薯和小麦。这对父子采用轮作的方法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并且最终在当地定居。¹³⁵这说明华人移民只要有机会就能发挥出传统的经验，建立起复杂的农业生产体系。这里最值得一提的是葡萄种植业，因为它所衍生的葡萄酒产业直到今天仍然是维多利亚农业经济的主要支柱之一。维多利亚矿区在1850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有了葡萄酒酿造业，这是为了满足矿工饮酒的需要。到1860年代中期，葡萄酒业全面发展，可是如果要保证足够的产量和地道的口味，还需要特殊葡萄品种的引种、剪枝、采摘、储藏与加工，全部过程都很麻烦。它既需要密集的劳动投入，又需要严格的工艺规范，果园终年需要照顾，回报周期也长，不同于一般的蔬菜和庄稼的种植。华人几乎在第一时间就卷入了这项产业，虽然绝对人数不多，却获得了很高地位。一个佐证就是葡萄园里华人的工资丝毫不比白人技术工低，甚至更高，而这在纯体力劳动的农业雇工领域是不可能的。一个最极端的例子是，1864年奥利弗山（Olive Hills）大葡萄园主休·弗雷泽（Hugh Fraser）干脆宣布只愿意雇用华人，他说华人粗活细活都能做，性格也非常文静温顺，从不酗酒聚会。¹³⁶在这一领域有限的早期材料中很难找到华人是否有什么特殊技术让葡萄园主如此青睐，但是一份较早的报纸材料为人们提供了有趣的线索：“不能不说华人在照料果园方面有一套，他们会嫁接，而且在移植植株之前会时不时扭折枝条或者切掉植株的一块皮，为的是把它们栽种到土里时能够恰当地促进新根的发育。”¹³⁷这段记述至少说明许多华人具备一些让果园主无法抗拒的专业技能，比如嫁接、插苗、蓄根等等，这都是葡萄种植关键的技术。考虑到许多四邑移民本身是水果种植业的专家，在维多利亚葡萄园很快就发挥自己的专长也可谓水到渠成了。

应该说，虽然华人移民在淘金活动中遭遇了一些瓶颈，但他们及时发挥了自己

¹³⁴ Colin Webb and John Quinlan, *Greater Than Gold: a History of Agriculture in the Bendigo District from 1835 to 1985*, p.270.

¹³⁵ Jocelyn Groom, *Chinese Pioneers of the King Valley*, Wangaratta Centre for Continuing Education, 2001. 参见条目“潘阿兴”（Pan Ah Shin）。

¹³⁶ David Dunstan, *Better Than Pommard! A History of Wine in Victoria*, Australian Scholarly Publishing, Melbourne, 1994, p.110

¹³⁷ *Argus*, 23 June, 1855

在农业方面的天才，在维多利亚矿区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种植业活动，大大补充了他们在蔬菜种植业上已经展露的才华。无论是需要体力劳动还是技术劳动，华人移民都可以胜任，这使得他们在淘金热中日渐暗淡的排华思潮下能够继续维持生计。同样重要的是，他们的农业种植活动也成为维多利亚环境变迁的重要推动力量，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华人的助力，维多利亚矿区及周边能迅速出现星罗棋布的蔬果种植园以及家庭农庄。

第六节 论种族主义与华人生存环境的恶化

老问题再检讨

华人为何遭受排斥？这是所有澳洲华人史研究者都无法回避的老问题。排华意识最终会导致一支如此庞大的移民群体一度消失于澳大利亚的历史记事，可见其威力与危害。但首先要指出，在一些研究中，出于对华人历史遭遇的不平，许多学者把白人与华人的冲突不加区别地看成是对华人的排斥，这有矫枉过正之嫌。其实这里应该区分两个层面的概念：一是华人与白人之间的具体矛盾、二是白人社会的反华政策与思潮。¹³⁸通过前文对华人移民淘金及农业生产活动的分析，可以看到华人移民与白人移民之间既有合作交流，也有冲突矛盾，尤其是在大家都想分一杯羹的早期浅表沉积金矿开采活动中，白人矿工会蛮悍无情。在官方管理协调措施常常滞后的情形下，互不熟悉的移民们要汇集一隅竞争有限的自然资源，不出现摩擦斗争才是奇怪的。事实上，白人与华人存在许多矛盾，可不同国籍的白人矿工间也常有冲突，而华人内部也绝非铁板一块。比如 1856 年在本迪戈白山矿区（White Hill）就发生了规模不小的华人斗殴事件，不同县域背景的四邑移民混战一团，惊动了整个中部矿区。¹³⁹此外，维多利亚是英国殖民地，以盎格鲁移民群体为主的白人移民因为优越感而在采矿活动中欺压其他人也是不出奇的。何况相对来说华人对外交往时习惯通过委曲求全而息事宁人，更显得软弱可欺。所以说移民群体间的矛盾是难免的，不可一概而论地说就是排斥华人，特别要注意的是，绝非所有的白人都排斥华人。然而，当维多利亚淘金热中逐渐建立起只针对华人的歧视性政策时，问题就耐人寻味了：在淘金热头十年中，维多利亚州议会在 1855 年、1857 年和 1859 年三次颁布针对华人移民的立法，先是通过人头税和船只吨位核定来限制华人入境、接着把华人驱赶进指定营地隔离居住，最后干脆对华人征收惩罚性居留税，恫吓潜在的华人移民，排华政策实属步步惊心。¹⁴⁰由此人们才看到大批华人矿被迫在南澳大利亚殖民地登陆，然后跋山涉水、风餐露宿数百公里才抵达维多利亚矿区。1855 年维多利亚议会颁布了歧视华人的立法，开启了整个澳大利亚殖民地类似法案的先河，它也被认为是白澳政策的发端。¹⁴¹而前文已述，维多利亚矿区的华人从 1853 年起才开始大幅增长。但是 1854

¹³⁸ 英语学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克罗宁的《殖民地的牺牲品》，华语学界更不区分这两者的微妙差别。

¹³⁹ *Argus*, 16 September, 1856.

¹⁴⁰ 这三项法令如下：“An Act to Make Provision for Certain Immigrants”(12th June 1855)；“An Act to Regulate the Residence of the Chinese Population in Victoria”(24th November, 1857)；“An Act to Consolidate and Amend the Laws Affecting the Chinese Emigrating to or Resident in Vicotria”(24th February, 1859)。

¹⁴¹ 张秋生，《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史》，第 124 页。

年3月墨尔本港口就发生了华人被围攻的事件，而这些华人刚刚上岸，尚未开展任何活动。同年6月，本迪戈第一次迎来了4000人的华人大股移民，结果7月4日白人矿工就试图组织1500人的游行要驱赶华人，事态经过警察介入才得以平息。¹⁴²显然，一种超越具体生产生活矛盾的非理性排华情绪在迅速滋长，这使得1855年法案的出台并非偶然。而从此开始，不管人们找到多少友好合作的案例，作为一种群体概念的华人开始遭受种族主义思潮的排挤，日益沦为澳大利亚白人社会中的“他者”。

对于排华的理由，学界早有一些总结。第一个原因就是华人的激增引起了白人群体的警惕和恐慌。比如1854年金矿委员会报告听证材料中卡索曼的酒店老板亨利就说“可能会有100万华人将陆续赶来，太恐怖了。”¹⁴³这反映了当时一种普遍的心态，即鉴于中国的人口基数，如果听任华人涌入，白人迟早成为种群上的弱势力量。而在华人移民增势大幅减缓后，维多利亚州议会的确在1862年取消了一些限制华人入境及活动的条款。另一个重大理由是，白人工人担心华人会抢走自己的工作机会或者压低工资，这种经济上受威胁的感觉大大助长了中下层白人移民对限制华人入境与就业的呼声。比如1860年代中后期，尽管只有很少的华人矿工加入深井作业的石英金矿开采，但是白人矿工联合会还是要求议会立法明确规定不准石英矿公司雇用华人。1870年，维多利亚石英金矿开采业的16500人中只有100个中国人，但是矿工们反华呼声仍然高涨。¹⁴⁴其他理由还包括政治上的不安——许多人担心华人的到来会破坏维多利亚新生的代议民主制度，因为华人是专制君主统治下的“天朝人”（Celestials）。比如作为美国国庆日的7月4日常常是反华游行或袭击的高潮时段。出于生活内容上的反感也不少，比如华人不带家属女眷的问题特别引人关注，许多白人认为这导致了华人的狎妓行为，甚至有人怀疑华人有同性恋倾向。此外华人喜欢赌博及抽鸦片的陋习也被带到了维多利亚矿区。1868年华人问题调查团的报告就着重强调了上述这些令人生厌的问题。¹⁴⁵这些分析都解释了为什么不同层次的白人都可能有反华情绪。但不可忽视的是，多数讨论都是根据当时白人舆论给出的理由来做出论断的，而那些舆论本身可能已经包含歧视性的判断。比如对华人压低工资的指摘，说起来它构成排斥华人的理由，可它本身也是歧视华人的结果。所以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去理解淘金热中排华意识的演变呢？华人真是自绝于殖民地主流社会吗？对此安·科特伊斯提醒说：“白人先拿种族主义的观点去衡量中国人，判断哪些方面能够同化，那些不能，接着再进行同化，最后根据其同化与否作为证据去巩固那些种族主义观点。”¹⁴⁶这是极富有洞见的。而又如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所说，

¹⁴² Kathryn Cronin, *Colonial Casualties: Chinese in Early Victoria*, p.43.

¹⁴³ “Evidence Presented to the Commission on the Chinese, including those of J. A. Panton and the Chinese Howqua”, *VPLC*, 1855. p.237. 比如

¹⁴⁴ 由于不同矿区的采矿方式不尽相同，某些矿区参加了石英矿开采的华人也是有的，巴拉腊特甚至出现过两个华人自己的公司，但也是仅有的此类公司，而且很快就破产了。相比于白人矿工的数量，以上都是微不足道的。Anna Kyi, “Unravelling the Mystery of the Woah Hawp Canton Quartz Mining Caompany, Ballarat.” *Journal of Australian Colonial History*, vol. 6, (2004), pp.63-64.

¹⁴⁵ W. Young, “Report on the Condition of The Chinese Population in Victoria” (August 1968), no.56.

¹⁴⁶ Andrew Markus, *Fear and Hatred: Purifying Australia and California, 1850-1901*, Sydney: Hale & Iremonger, 1979. “preface”.; Ann Curthoys and Andrew Markus, *Who are our enemies? : Racism and the Australian Working Class*, p.25.

欧洲人对非欧洲人的理解“凝固在特定的时空中”。¹⁴⁷ 1855年官方报告中所描绘的华人形象在数十年之后仍然被主流舆论广泛采纳。所以今日研究切不可忽略一个最根本的历史场景，那就是维多利亚淘金热是一种移民拓荒式的自然资源开发运动。人们必须在自然开发运动的变化中理解排华意识的变化。一个根本的情况是：在维多利亚，自然资源的占有划分本来取决于人群适应或改造当地自然的能力，但是到十九世纪殖民扩张的背景下，这种对自然资源的分配原则又要夹杂进种族文化背景的分野，这就使得金矿开发中华人移民与白人移民的权利博弈复杂曲折。种族歧视制度之所以成为白人必需的武器，是因为它可以保证白人对自然资源分配的话语权最大化。所以这里将先分析淘金热时代白人种族歧视意识形态的内在逻辑与特点，然后再看看它排斥华人的话语究竟是如何不断升华的。

白人种族主义的逻辑悖论

澳大利亚是英国殖民者最晚开发的海外领地，他们抵达澳洲的时候，土著居民早已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数万年。可是白人在抢夺土著领地时丝毫没有犹豫，反而理直气壮。如第二章中所说，在维多利亚殖民地前身菲利普港区草创的过程中，白人移民曾肆无忌惮地圈占土地，因为他们认为维多利亚的土地都是无主或者荒废的。在淘金热达到高潮的1855年，就有专栏作家鼓吹说白人占有这里的所有领地，“土地属于主（Lord），土著不曾定居其上，更不曾耕种从而改良过土地（improvement）。”¹⁴⁸众所周知这是白人殖民者在全世界抢夺土著土地时都曾惯用的一种说辞，他们是以一种人类中心的功利主义价值标准来决定自然的归属。殖民者认为自己可以主宰澳大利亚土地的另一个理由具有所谓科学依据，那就是“进化论”。1832年，查尔斯·达尔文在考察一个白人牧场后感慨说：“英国种的猎犬‘灰狗’是鸸鹋和大袋鼠的克星。这些动物的灭绝可能还需要较长时期，但它们的命运已定，当地的土著民经常到农场来借‘灰狗’。殖民者借给土著民‘灰狗’，宰杀家畜后把内脏下水分给土著民，或分给一些牛奶，来拉拢土著民，而他们的农场、牧场也就逐步向内地扩展。没有头脑的土著民被这些小恩小惠蒙蔽了双眼，还欢迎白人的到来，而这些白人看来早已决定要让他们的子孙后代来继承这片土地。”¹⁴⁹显然，达尔文清楚地认识到，白人对澳大利亚土著的先进性，不仅是经济和社会意义上的，更是环境生态上的。包括白人本身在内的欧洲舶来的各个物种，一起构成了本土物种无法抗衡的优势。总之，当白人移民以拓荒者的身份面对澳大利亚的本土自然环境时，他们的种族主义逻辑就是：谁能更好地利用自然，谁就有权利占有它并藉此生存。不过，淘金热中华人的涌入让白人移民感到措手不及。因为此时出现的华人移民工作效率更高、更能忍受矿区恶劣环境的挑战，从而实际上更好地“改良”了土地。1848年华人移民的出逃插曲说明华人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未必能适应当地的自然条件，但是在淘金热巨大的利益诱惑下，华人适应和改造维多利亚自然的能力脱颖而出——淘洗废旧矿渣也

¹⁴⁷ 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142页。

¹⁴⁸ *Argus*, 16 April, 1855.

¹⁴⁹ 查尔斯·达尔文著，《乘小猎犬号环球航行》（褚律元译），人民大学出版社，第412页。

能够收获黄金、在利用真正废弃的土地时还能建立起生机勃勃的菜园，不一而足。总之，华人移民在将自然资源转化成财富时表现出的组织模式、工作态度、劳动强度以及所需报偿都是白人社会无法抗衡的。摆在澳洲白人移民面前的事实是，华人的一些既有经验完全可以在新环境下发扬光大，而在无法适应本土环境的情况下华人也能做出及时的变通。那么按照白人抢占土著土地的逻辑，华人岂不是应该接替白人成为这块大陆的新主人？

白人舆论当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很快就偷换了概念。早在 1855 年，维多利亚殖民地发行量最大的《时代》杂志（*The Age*）与发行量最大的报纸《阿尔戈斯》就联合发文惊呼：“华人其实很适合这里的气候，而且相比于英国人，他们对这块土地的耕种和开发更加多样、有效。”¹⁵⁰一些思想更自由开放的作者则指出：“在抵达并占领土著土地时，欧洲人并不比亚洲人拥有更多的权利。来得早并不是关键性的因素。我希望社会和政治的安排能让所有人都享受好处。”¹⁵¹但是更多的观点如下：同是 1855 年，有媒体谈论保护欧洲移民的利益时说：“人们的慈善家说土著反抗白人是合理的，因为人们抢占了他们的狩猎地，……那么同理（对待华人时），人们认为这一原则可以适用于定居在一块英国属地上的欧洲矿工。”¹⁵²1856 年《阿尔戈斯》杂志宣称：“是的，我强烈反对华人移民，……虽然我是从英国移居此地，可我深深热爱澳大利亚，因为这里的土地和资源属于英国人，更属于在这里定居的人及他们的子孙后代。”¹⁵³1857 年，卡索曼地方法院代表向州议会提交申诉说：“中国佬的大量涌入，让那些把维多利亚当做大不列颠母国属地的移民产生了最沉痛的悲哀，这里事实上变成了一个中国殖民地，而且由于错误的慷慨，丰富的金矿石被运往中国，这间接地导致资源开发无法帮助人们去打破对文明进步及启蒙的现实障碍。”¹⁵⁴从这些论述中就可以看出一种价值判断上的双重标准：面对土著时，白人殖民者强调谁更能干谁就更配占用资源的逻辑，而面对华人时，闭口不谈谁更能干的问题，却以民族国家的分野来确立资源占有的原则。最具讽刺性的是，1860 年代起，极少再看到有白人舆论把土著和华人相提并论，这首先是因为白人人口越来越多、社会地位愈加巩固，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主流舆论的心虚——只要同时谈论土著和华人，无论用哪一方的经历来支持对另一方的种族歧视，都会陷入道德和逻辑的悖论。这些材料还说明淘金热中白人种族主义意识与自然资源特别是土地的占有分配问题紧密相关。不管找什么文化或者科学上的依据，种族主义思想都日益露骨地沦为白人移民排斥其他人群生存空间、独霸自然资源的工具，哪怕内在逻辑自相矛盾。是故安·科特伊斯评论淘金热中白人种族主义者对华人的歧视时说：“这里同时包含了生态和文化上的因素。”¹⁵⁵

种族主义与华人生存环境恶化之关系

¹⁵⁰ *The Age*, 17 April, 1855.

¹⁵¹ *Argus*, 15 June, 1855.

¹⁵² Andrew Markus, *Fear and Hatred: Purifying Australia and California, 1850-1901*, Sydney: Hale & Iremonger, 1979, p.240.

¹⁵³ *Argus*, 25 June, 1856.

¹⁵⁴ “Petition” (17 July, 1857) E.18, *VPLC*, 1856-57.

¹⁵⁵ Ann Curthoys and Andrew Markus, *Who are our enemies?: Racism and the Australian Working Class*, p.41.

在明确淘金热中反华种族主义诞生的基本逻辑后，再来具体分析它如何在几十年的时间里确立起自己的全面影响。需要再次提醒的是，即便在种族歧视最为叫嚣的时期，维多利亚殖民地社会也依然存在不少华人与白人移民友好共处的案例。可是由于反华种族主义关系到华人整体未来的命运及澳大利亚历史的走向，人们更需要留意它如何把一种自然资源分配上的矛盾纠纷转化成单方面的种族压迫，由此就可以换一种视角理解白澳政策成长的复杂后果与机理。

就自然资源分配纠纷而言，水源分配是最突出的议题，甚至超过金矿开发本身。因为如果华人在淘金中遭受排斥，还可以靠废矿旧矿谋生，或者转行搞农业。可不管何时何地，水都是生产生活所需的。前文已经分析了华人矿工淘洗旧矿废渣额外耗水的问题，可是他们为此招致了远超过其应当承受的惩罚，甚至面临生存危机。为了缓解水源使用矛盾，维多利亚议会在 1856 年和 1857 年有管理矿工的规定分别如下：“第四条：中国人不得使用受到特定保护的水淘洗金沙，无论谁都不可以动用保护官下令禁用的水源。”“第十条：任何中国矿工及其他矿工都不可毁坏、破坏、污染、阻塞水坝、水流、泄水槽、水道或者干扰与采矿活动有关的水源供给。”这种出于保护水源的立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其中也只是格外强调了华人矿工用水的条件。可现实的情况是，白人种族主义者藉此来剥夺华人矿工对一般水源的使用权，因为他们认为水资源只能为他们所独享。本迪戈历来是紧缺水资源的大矿区，于是一些华人遭遇过格外苛刻地排挤，凡有旱灾，华人矿工受苦就更多。1865 年本迪戈矿区遭遇大旱灾，在所有淘金活动都缺乏水源支撑的情况下，华人的工作尤其受困。因为白人完全霸占了主要水源，其借口就是预防华人干扰水流走向。1865 年 1 月至 1866 年 3 月，短短 14 个月华人死亡 17 人，多数是因为彻底失去了工作机会而贫病致死。验尸官查看了 1866 年 3 月死掉的阿金（Ah Kim）的情况，华人翻译阿波（Ah Poo）介绍说：“他和许多中国人一样，因为完全没有水来淘金，结果变得赤贫，饿死了。”¹⁵⁶1878 年 1 月又是酷暑大旱，本迪戈下属铁皮桉树（Ironbark）矿区中 300 名中国矿工居住区水源断绝，但无人问津。“他们的小水库里干涸见底了，却得不到一丁点儿淡水，只能靠一些旧矿道里存积的咸水过活，火灾和健康隐患都已非常严重。”此时本迪戈矿区已经有了稳定的供水系统，可是华人的缺水情况居然发展到连饮用水都没有保障的程度。当初立法只是为了保护水源，避免华人因为耗水而导致采矿纠纷。可这两个发生在淘金热中后期的案例说明，现实中对水资源的管理和分配已经达到酿成人道主义灾难的程度。华人有关的投诉不被采纳，而舆论反复强调华人可能会浪费水。尽管当时已有一些华人不再与白人移民产生用水纠纷，也有条件购买或引导水源以维持生活和生产，但只要白人想霸占水源，华人就束手无策。1857 年之后，州议会不再关心天然水使用问题，地方议会则只关心满足白人居民需求的供水系统建设，对华人的用水需求不再有制度性安排。从这里就可以看出种族歧视意识的膨胀大大恶化了华人的生存环境，而殖民地政府的无作为让一种本该具有时效性的法律文本被夸大诠释为排斥的合理依据。

¹⁵⁶ Valerie Lovejoy, “Depending Upon Diligence: Chinese at Work in Bendigo (1861-1881)”, p.28.

事实上，水源分配矛盾是非常显性的问题，它一直得到了学者们的注意，但还有一个方面的问题直到最近才通过梅·艾（Mae Ngai）的研究引起注意，那就是维多利亚矿区华人营地的管理，这里涉及所谓的华人保护居留制（Protector System）。¹⁵⁷众所周知，华人移民喜欢根据地缘关系集体工作与聚居，但梅的研究显示，维多利亚淘金热中华人的密集化定居绝不仅仅是传统习惯使然，也是官方推动的结果。尽管梅的研究关注这种制度本身的变迁，但在此基础上通过进一步搜集相关的资料，可以发现保护居留制更深刻地反映了种族主义如何恶化了华人的生存环境，而这种生存环境的恶化又如何加剧了对华人的排斥与迫害。

所谓的保护居留制就是维多利亚议会要求所有华人集中居住到矿区附近指定营地、然后由官方派出保护官（protector）加以管理的隔离居住制度。这一制度从 1855 年 9 月正式开始推行，到 1862 年终止，期间保护官有权根据当地情况决定营地选址并要求华人在 7 天内完成搬迁。在这种隔离居住制度下，每个区要推选出华人头领和若干翻译负责与保护官的沟通，矿工虽然可以前往自己选定的矿坑工作，但无论多远都不能再住在矿坑边，这大大制约了华人矿工的作业时间与矿坑保护。这个制度出台的现实原因有两个，第一是华人与白人移民围绕矿坑发掘和用水问题纠纷不断，第二个原因是华人普遍不通英语，在日常生活中屡屡出现沟通障碍。¹⁵⁸保护居住制从来没有严密执行，它在 1860 年后逐渐松动，直到 1862 年正式取消，但它造成的影响非常深远。这项决定反映了维多利亚官方对解决种族矛盾的另一种态度：它不像底层白人矿工那样试图激进地驱逐华人，但又想不费功夫地解决层出不穷的矛盾纠纷，于是采用一刀切的方式将华人隔离。保护居住制从一开始就要求华人单方面让步，具有歧视性，而且本质上是回避而不是化解矛盾。这样一种鸵鸟埋头避险的态度注定了更大的麻烦。

首先激化的矛盾是卫生问题。1855 年之前华人帐篷区的分布与白人的一样是密集但无规律的，它完全取决于金矿矿坑的实际地理分布。当时采矿本身的条件就决定了不论是谁都很难维持清洁卫生，不管是个人的还是公共的，因为矿工整天要同矿土与泥浆打交道，而且也不顾上时时清洁内务。1855 年之后，在本迪戈、卡索曼与巴拉腊特等地，“保护官开始把华人聚拢然后分配进一个个居民点。对一些既有的定居点也予以保留，但是其传统、狭窄、蜷曲的里巷被宽阔、笔直的街道替代。”¹⁵⁹可这只是最初的状态，随着华人移民越来越多，而定居点却没有同步增加，结果定居点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到 1857 年，一系列的问题终于爆发了。卡索曼地方法院代表说：“华人居住的太密集，导致空气不流通，四处散布的垃圾堆上积聚起难闻的臭气，再加上华人本身也不干净，这很可能导致从他们的定居点散播出流行病，周边地区在紧张地关注。”¹⁶⁰又说：“这里存在致命的中国瘟疫，大大戕害欧洲人口，中国人营地臭得令人作呕，有一股腐烂的味道，中国矿工的营帐害虫四溢。……中国

¹⁵⁷ Mae M. Ngai, “Chinese Miners, Headmen, and Protectors on the Victorian Goldfields, 1853-1863”, *Australian Historical Studies*, vol.42, no.1,(March, 2010) pp.10-24.

¹⁵⁸ *Ibid.*, pp.11-12.

¹⁵⁹ Kathryn Cronin, *Colonial Casualties: Chinese in Early Victoria*, p.90.

¹⁶⁰ “Petition of **Castlemaine** Local Court Members” (17 July,1857) E.18, *VPLC*,1856-57.

人的帐篷区里常见发烧、麻风、黑热病（black fever）以及溃疡性皮肤病疹（ulcerous skin eruption）。”¹⁶¹在本迪戈，一些华人矿工得了肺结核之后还是得住在恶劣拥挤的环境里，结果引发过矿工中的肺结核流行。¹⁶²在这种局面下，白人矿工要求进一步隔离华人的呼声高涨。1857年，本迪戈华人定居区发现三个麻风病人，结果本迪戈和卡索曼的保护官要求所有营帐重新布局而且烧掉旧有营帐，然后下令严禁华人与白人矿工产生任何接触。而坎贝尔溪矿区的（Campbells Creek）矿工呼吁说：“无论是从道德上还是从生理上，人们都不能再和中国人生活在一起了。”¹⁶³为了解决卫生问题，许多保护官规定了华人居住区内部的保洁要求。如一份当年被翻译成中文的文件说：“皇家告谕……凡楼布帐门口全向至少离三尺。凡街巷大陆留余地二十五尺寸可盖搭。凡个人所居之地方布帐门口总要洁净。凡各所举止地方勿搭猪羊栏在街内。”¹⁶⁴但更荒唐的是，为了解决华人营地的卫生问题，议会颁行了向华人征收额外卫生费的措施，每个月缴纳一次，根据营地大小数额不等。比如1856年，议会从华人那里收的卫生费和土地税已经高达21242英磅，可官方用于华人事务的行政开支总计只有9841磅。¹⁶⁵卫生费成为比金矿税本身更高的收费，卫生状况并没有实际改观。事实上，1860年州议会健康调查委员会在批评华人定居区卫生状况后一语道破了根源：“如果白人矿工也这么蜷缩聚居在一起，卫生状况照样不可能好。而且在这种居住条件下，想管理好卫生极其不容易。”¹⁶⁶此外还有许多案例证明，华人营地卫生并不总是非常糟糕，但是管理当局毫无理解之心。

以上的直接矛盾直到1862年后华人可以重新自由定居才得以缓解，但在所谓的保护居住制下，华人的身心健康受到了无法掩盖的影响。更糟糕的是，华人的卫生形象已经沦丧到不可挽回的程度。到废除华人集中居住制度时，华人不讲卫生已经成为排斥华人的主要理由。1870年之后，整个澳大利亚都爆发了许多反华运动，华人污染环境以及传染疾病成为他们遭到迫害和驱逐的主要理由之一。到1881年，远在新南威尔士的悉尼爆发天花大流行时，在没有明确病源的情况下，当局就再次专门隔离了华人社区，理由就是华人社区曾被证明是不卫生的，会传染疾病。¹⁶⁷

不仅是卫生问题，华人隔离居住区本身的地理位置也为种族误解和迫害创造了条件。由于维多利亚金矿区多山地，所以官方一旦强调要隔离华人，许多情况下他们就被指定到地势孤绝的山区峡谷居住。比如卡索曼矿区以南的沃恩（Vaughan）地区就是很典型的例子。保护官将此处的华人定居点安排在一个谷地里，为的是让他们避免与白人矿工在生活上接触。考古学家的调查显示这里风景优美，但是地形崎岖，地质坚硬，并不适合居住。罗登河从这里流过，但是河岸两边都是高耸的悬崖，根本让人无法从侧面进入，而且由于可居住面

¹⁶¹ “Petition miners Castlemaine”, *Victorian Parliament Legislative Assembly(VPLA)*, 1856-57. vol.3.p.989.

¹⁶² V. Lovejoy, “Depending Upon Diligence: Chinese at Work in Bendigo 1861-1881”, p.47.

¹⁶³ “Petition miners Castlemaine”, *VPLA*, 1856-57, p.975.

¹⁶⁴ *The English Chinese Advertiser*, 28, November, 1857. 本文件仅藏于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东亚部。

¹⁶⁵ Kathryn Cronin, *Colonial Casualties: Chinese in Early Victoria*, p.93.

¹⁶⁶ “The Annual Report of Central Board of Health” (1860), *VPLA*, 1861. (原册 92 页)

¹⁶⁷ Greg Watters, “The S.S. Ocean: Dealing with Boat People in the 1880s”, *Australia Historical Study*, vol. 20, no.120, (October 2002), pp.331-341.

积狭小，华人营地帐篷也只能挤挤挨挨。明明是被迫来到这种环境居住，可河谷外的白人居民却由此萌生了对华人犯罪的忧虑：“这一地区许多山岭和谷地是难以进入的，之前就为不法分子提供了理想的藏匿之所，……现在幸亏有两个巡警，否则还不知道这里会闹出什么幺蛾子。”¹⁶⁸

如果说地理因素在沃恩地区仅仅造成了认知上的隔阂，那么在巴克兰河谷（Buckland Valley）则加倍导致了煎熬和牺牲——这里同时爆发了卫生与治安上的问题。巴克兰河谷位于维多利亚东部，因为巴克兰河穿过而得名。其两岸地势如同沃恩一样，都是高耸陡峭的悬崖，可是其谷地更加狭窄，抬头甚至都难以见到阳光。由于工作环境太恶劣，1855年初这里爆发淘金热时矿工死亡率高居全维多利亚矿区榜首。正是由于地理上的局限，白人矿工并不愿意前来，所以当这里聚集起2000-2500名华人时，白人矿工只有不到200人。即便在人数上处于绝对多数，华人还是被要求隔离居住。恶劣的居住环境迅速导致了严重的疾病问题。从1857年冬天开始，许多华人开始患上神秘的疾病，当时被称为“关节积水病”（Ankle Vapour）。其主要病症是头、身体和腿严重浮肿。这个病死亡率极高，一周内就可以夺取20多个人的生命，而且人死之前皮肤会变成蓝紫色，许多中国人恐慌地逃离了营地，可头人和保护官都认为这仅仅是由水土不服和冬季冷风引起的，不予以重视。¹⁶⁹据瑟利的研究显示，这种疾病就是伤寒，在整个淘金热期间造成了谷地1000多人的死亡。¹⁷⁰1857年7月4日夜，一些白人矿工饮酒庆祝美国国庆日，随后他们召集了100多名同伴鼓吹要把华人统统驱赶出去，而在操作方法上他们则充分利用了华人营地的特殊地势。“当时华侨之钻井皆在山边沿河岸之处。英人于夜间扎断两山出口，然后放火焚山”。¹⁷¹不知所措的华人四散逃亡，许多人逃进数十公里之外的农场才得以脱险，而闹事白人矿工却在次日结成了“维多利亚矿工反华联盟”。在这场突袭中，华人当场死亡的就有3人，受伤不计其数，共有750顶帐篷、30家华人商店被抢劫后焚毁。克罗宁强调，突袭之所以能发生在巴克兰河谷，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这里交通不便，与外界相对隔绝。当时设立这个华人营地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华人出逃，结果现在暴乱后也不便于真相的传递。¹⁷²果然，在华人被驱赶出河谷半年后维多利亚议会才听取了保护官的有关报告，不仅没有要求认真追究刑事责任，连计算财产损失时都在强调“绝不能只听受害人自己的申报。”¹⁷³不仅如此，议会为了避免进一步的冲突，又追加颁布法令要求全殖民地12岁以上华人每月缴纳1英镑营地居留税，借此警示华人。有些营地如本迪戈则加大隔离强度，华人出营地甚至要通过头人向保护官提交申请才可放行。¹⁷⁴在

¹⁶⁸ *Public Record of Victoria*, Victoria Public Record System, 1192/P0, Petitions, Unit 45.转引自：Keir Reeves and Benjamin Mountford, “Court records and cultural landscapes: Rethinking the Chinese gold seekers in central Victoria”, p.9.

¹⁶⁹ Kathryn Cronin, *Colonial Casualties: Chinese in Early Victoria*, p.21.

¹⁷⁰ Geoffrey Serle, *The Golden Age: A History of the Colony of Victoria, 1851-1861*, p.80.

¹⁷¹ 陈志明编，《澳洲党务发展实况》，第11页。

¹⁷² Kathryn Cronin, *Colonial Casualties: Chinese in Early Victoria*, p.21.

¹⁷³ “Report of the Board appointed to consider the claims of certain Chinese in the Buckland District to Compensation” (31 December, 1857), no.6, *VPLC*, 1856-57.

¹⁷⁴ Mae M. Ngai, “Chinese Miners, Headmen, and Protectors on the Victorian Goldfields, 1853-1863”, p.20.

这种情况下，华人发动了大规模地申诉和逃亡活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这一制度的瓦解。但由于这种隔离，华人与白人矿工之间的疏离感也无可避免地加剧了。最后，明明是制度上不让华人与白人融合，排华意识形态却反过来强调华人无法融入白人社会，真可谓是种族主义自我实现的寓言了。

从水源分配与保护居住制的案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华人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的根源：官方不合理甚至歧视性的决策引发了特别困扰华人的环境问题，而这些问题在特定场合下强化了白人种族主义者对华人的偏见和袭击，面对更剧烈的矛盾纠纷，政府要么不作为，要么加大对华人的单方面惩治，总之无视华人福祉。结果这进一步强化了主流社会对华人的孤立和排斥立场，反华的理由也更多了。事实上，无论是官方的政策还是激进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其最终目的都是要塑造华人他者的地位，由此突出维多利亚的自然资源只属于白人殖民者。通过考察环境因素与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发展之间的关系，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白澳政策成长的过程：带着歧视去处理华人移民与白人移民的冲突、隔离华人、酿成更多矛盾后再强调隔离的合理性，最后通过更苛刻的制度来巩固排华意识，华人就这样一步步迎来更加边缘化的社会地位。

小结 论淘金热中华人环境经验的散播、嬗变与边缘化

本章较为完整地讨论了华人参与维多利亚淘金热的过程。可以说，华人卷入维多利亚淘金热既是由移民输出地内部的社会、生态压力所决定，也取决于新大陆资源边疆拓展所带来的创业契机——黄金是其中最大的诱饵。必须强调的是，华人移民澳洲从属于十九世纪中期更宏大的全球移民浪潮，而这里最关键的媒介是西方殖民者编织的近代太平洋贸易网络，这使得华人史无前例地与遥远空间中的人与物互动。事实证明，在维多利亚淘金热所引发的全球环境经验交换中，华人经验的传播与嬗变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它是对欧美移民与澳大利亚本土自然环境互动最重要的补充。

就此，首先应该对华人移民本土环境经验的形成予以充分认识和认可，因为这为他们在维多利亚殖民地的生存与发展活动提供了行动准则和技术准备。华人对异地环境的适应力以及遇事的灵活变通能力同样非常重要，这使他们能够一方面大力发扬一些传统经验，另一方面敞开吸收白人的经验、改造自己的实践，从而极大强化了自己在淘金热中的竞争力。

其次，华人移民与维多利亚环境互动的内容和过程是复杂的。华人不仅通过不同的淘金行为影响了矿区景观的变化，更凭借多样化的农业生产活动改造了维多利亚矿区的环境，这其中既有建设作用，又有破坏作用。相比于白人矿工，华人矿工造成的主要环境问题是消耗水源，但是他们对土地的破坏与浪费明显更少。至于蔬菜种植业等农耕活动则大大促进了当地生态体系的恢复，虽然维多利亚本土生态体系已经无可挽回地改变了。同样重要的是，维多利亚的自然环境也大大影响了华人的生产与生活，尤其是限制了华人深井淘金的成功空

间，也导致了他们的额外牺牲。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是，华人在维多利亚淘金热中的环境经验不仅仅是由他们与当地自然环境所共同塑造，更是他们与白人移民社会互动的结果。华人移民与白人移民在生产生活中是既有合作也有矛盾的，这反映出不同文化背景的移民群体在面对异类环境经验时不同的立场与理解。华人在受益于一些白人技术经验与物资援助的同时，更遭受了许多制约甚至损失，而这是由白人移民社会愈演愈烈的种族歧视态度所导致。澳大利亚白人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包含极其狭隘、矛盾且功利的生态自然理念。在维多利亚淘金热中，面对华人移民经验的有力挑战，它强化为一系列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最终把华人及其经验负面化、边缘化。从踏上寻金之路起华人就遭受了白人无需忍耐的环境危险，这种境遇一直羁绊着他们的整个淘金历程。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华人生存环境的恶化与白人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是相互加深的，华人面临的许多环境困难既是种族主义的结果，也是新一轮歧视的诱因，而从这里可以看出白澳政策起源与成长的基本逻辑。不过，华人移民与白人移民至少在一个问题上是没有差异或分歧的，那就是淘金热给他们带来了发财的幻想。无论是白人移民还是华人移民，他们都只看重自然要素的经济属性，他们愿意为了尽可能多地攫取自然财富而忍受各种环境挑战。无论是欺人或是被人欺，他们都反映出淘金热时代所谓文明世界的主流自然观，那就是让自然彻底服务于人类所需。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维多利亚淘金热华人的环境经验深深融入而绝非被排除在澳大利亚近代发展的宏图之外。